



# 苏轼词的“天涯”寓意探索

黄秀妹

NG SIEW MOI

拉曼大学中文系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1

#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 苏轼词的“天涯”寓意探索

科目编号：UASZ 3063

学生姓名：黄秀妹

学位名称：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老师：林良娥师

呈交日期：二零一一年四月十五日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 宣誓

仅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以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08AAB04332

日期：

## 摘要

苏轼不仅是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家，也是位“儒、道、佛互补”的思想家、亦是“以诗为词”的文学家。作为北宋的文坛领袖与文化巨匠的苏轼，青年时期在接受儒家思想教育的同时，也深受当时儒、道、佛互补文化思潮的影响，对道与佛的感染甚深。随着宦海沉浮和屡遭打击，苏轼的思想逐渐成熟、深沉与开阔，青年时期的他以儒家的经世济民为思想中心，随后中年时期思想逐趋步向儒、道、佛互补的道路，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淳朴自然、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和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结合起来，把“兼济”与“独善”有机的统一起来，经由世事无常对人生命运的影响从中深入思索和体悟，把心灵感受和精神自由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准绳，“人生，要适情耳”，从而为自己建构起一座心灵上的精神家园。

苏轼那“天涯何处无芳草”豁达的人生观与乐观的人生态度与他的仕宦生涯密切相关。青年时期初次贡举高第、备受名仕赏识此乃“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积极用世时期。然而，其思想也随仕途受挫而逐渐消沉，中年时期遭受“乌台诗案”贬居黄州后，苏轼陷入极度的绝望和苦闷之中，最终从道、佛的思想中获得人生的启迪，寻觅到一条能让身心解脱的管道。直到晚年时期再一次遭受命运的摆弄，基于“元祐党人”的身份而流放惠州、儋州，此时的苏轼在仕途的大起大落

中，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以内在超然物外的精神，豁达淡泊地看待人生无常这一人生命题。

基于新旧党争的激烈局势，而历经两度自请外任与贬谪的命运，致使苏轼几乎一生在地方上与贬所中度过，久经外任与贬居生活的氛围不仅对苏轼的思想起着莫大的影响，于其词中在初期时候形成了鲜明的“漂泊感”、“悲哀感”，这些负面的愁绪皆是苏轼在外任、贬居的人生经历中形成的。基于巨大的人生挫折，使苏轼不得不寻求一种精神上的真正解脱与平衡，从结合对佛道思想的感悟，逐渐体悟人生的无常，最终形成了“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豁达自适的人生观。然而，“天涯何处无芳草”的意象不仅仅是表征着词人精神上的乐观态度，亦是体验了人生无常后而形成的一种对自身信念的执著与对理想的坚持，在无常中坚守自我，秉持着自我的节操与一片赤胆忠心漫游在芳草之地。

在对苏轼词中出现“天涯”二字或与之相近意之词，进行分类分析的结果下发现：其一，苏轼黄州词作无“天涯”二字，乃是基于苏轼自身内在傲骨不逊的品格，面对“乌台诗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迫害，两厢形成强烈的抵触与矛盾，致使苏轼于词中多流露出是一种寻求精神解脱的思想。其二，苏轼流落天涯之际，那满腹倦世的心态但由始至终却无隐遁之举，乃是基于自身儒家忠君报国濡染甚深的思想所致。

然而，此文之所以以苏轼词作为探讨“天涯”对其人生的意义，乃基于苏轼“以诗为词”的创作意念，以词的形式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从苏轼的词作中，可以了解其在外任、贬居期间，不论心境上或精神上对“天涯”所抱持的人生意义。

**关键词：**苏轼；词；儒、道、佛互补；天涯；人生意义

## 致谢

在论文完成之际，首先向我的导师林良娥老师致以最真诚的谢意与最崇高的敬意。从开始选题的阶段以致论文的最终完成，导师皆悉心指导，并且倾注心力指点迷经，在各方位上给予我详尽的思考角度与宏观的知识层面，面对如此愚拙的学生一直保持着循循善诱的教导态度。从论文的各个方面：摘要、前言、章节的论述与分析、结语，甚是注释体例以至每个标点符号，都认真严谨的审视，并且提出更为全面又中肯的修改意见，同时对于论文有不足之处的印证论述亦提供相关查找的咨询媒介，还将私有藏书借出以助我一臂之力，承蒙导师的教诲再次敬上万二分的谢意。

还要感谢刘菽仪老师、叶秀清老师、吴洁盈老师、许文荣老师、黄丽丽老师、黄文斌老师、金进老师、余曆雄老师、方美富老师、王介英老师、曾维龙老师、莫德厚老师、李国正老师、李树枝老师等各位老师在这四年的学习中，从各方面传授给我广博的知识，让我的视野得以进一步的开阔。感谢林志敏老师，在我学习期间，时时关注我的课业情况，也时时给予我帮助与慰问，在此特别致以深深的谢意予各位老师不辞劳苦的无私付出与帮助。于此还要感谢拉曼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在我搜集资料的过程中给予大力的帮助。同时亦要感谢同届同学的热情帮助，感谢杨家顺同学、许倩颖同学、周伟俊同学、黄慧珊同学、纪月慧同学、郭淑美同

学、蔡长娣同学、陈宇响同学等，在我学习和撰写论文期间，为我提供了积极的帮助。在此又一次的致上由衷的感谢各位对我的关怀与帮助。

此论文虽已初步完成，但因自己才疏学浅，文中难免有疏漏之处。今后我会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养，以增值自己的知识，继续迈向前方的康庄大道。最后，还要感谢一个能回答我以下诸多问题的人。在一个大时代之下，要如何处理自己与人世之间的格格不入？如何在个体与集体意识面对冲突与磨擦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混乱的局势下，又该如何寻求一个能安身立命的堡垒，不致随波逐流？在“人”与“世间”之中，该如何给自己一个定位？人之降世，如何铺排自己的人生道路与选择自己该走的方向？这些种种的问题，苏轼尽其一生亲身的历练给予回应，将“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的感慨与苦闷，用词的形式反映出来。即便贬谪远至儋州亦怀着淡然之情面对，困顿的环境无屈于他对于人生的体验，在人生陷入迷茫与低潮时期，他能在迷茫中寻找前方的道路，在掉入低谷中亦不急不缓的向上徒行。然而，人的一生中会有多少次迷茫与低潮？苏轼告诉我们，在每一次迷茫与低潮中调整好自己的“心”念，才能迎接世间变化无穷的事物，才能在沙漠之中找到一片属于自己的绿洲。

# 目次

题目	.....	i
宣誓	.....	ii
摘要	.....	iii
致谢	.....	v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前人评述与文献回顾	2
	第二节：研究动机、范围、方法、目的、难题	7
	第三节：简述论文章节设置	9
第二章	与时代巨轮密不可分的苏轼	12
	第一节：书香世家	13
	第二节：奋励治仕	24
第三章	“天涯何处无芳草”豁达自适的人生观	55
	第一节：苏轼词中“天涯”出现的次数	55
	第二节：“天涯”对苏轼的悸动	67
第四章	“天涯”之际无黄州亦无归隐	96
	第一节：黄州词作无“天涯”二字	98
	第二节：倦世心态仍无隐遁之举	101
	结语	105
参考书目	.....	108

## 第一章：绪论

在此先略谈为何本文选择以“词”作为撰写论文的中心。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是莫能续焉者也。<sup>1</sup>

这实际上说明了，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各个文体在不同的时期，在各阶段显示出其独领风骚的独特韵味。然而，在先秦时期强调“赋诗言志”、“著述引诗”的基础上<sup>2</sup>，文人被挂上“不学诗，无以言”<sup>3</sup>的牌坊，于此同囿于娱宾遣兴之“词”之地位相较而论，却是大相径庭。历代以来“诗庄词媚”便是文人为这两个文体所定下的范畴，而“诗言志”<sup>4</sup>，“词寄情”也昭示着两者之间悬殊的地位，然至宋代苏轼“以诗为词”的写作革新打破了词体的旧有模式。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书画家。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是著名的文学家，世称“三苏”，亦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苏轼堪是全才大家，在诗、词、文、赋、文学

---

<sup>1</sup>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页1。

<sup>2</sup> 朱自清著：《朱自清说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页106。

<sup>3</sup> 陈亢问于鱼伯：“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见程树德著，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季氏》卷三十三，《论语集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168-1169。

<sup>4</sup>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见【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尧典》卷二，《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9。

理论等领域方面皆有涉足亦颇有建树，犹是对词体的革新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变革，从而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甚是提升至能与诗相抗衡的角色，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 第一节：前人评述与文献回顾

自宋代以来，对苏轼词各有评价：

（一）宋人王灼《碧鸡漫志》曰：“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sup>5</sup>

（二）宋人赵德麟《侯鯖录》曰：“鲁直云：东坡居士曲，世所见者数百首，或谓于音律小不谐。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子缚不住者。”<sup>6</sup>

（三）宋人陈师道《后山诗话》曰：“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逮也。”<sup>7</sup>

---

<sup>5</sup>【宋】王灼著，唐圭璋主编：《碧鸡漫志》卷二，《词话丛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页85。

<sup>6</sup>【宋】赵令畴著，孔凡礼点校：《侯鯖录》，《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243。

<sup>7</sup>【宋】陈师道著：《后山诗话》。见于总评资料，鄒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页1016。

(四) 金人元好问《新轩乐府引》曰：“自东坡一出，性情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sup>8</sup>

(五) 清人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曰苏词：“东坡词颇似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则是与太白为近。”<sup>9</sup>

(六) 清人陈廷焯（世焯）《词坛丛话》：“东坡词，一片去国流离之思，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寄慨无端，别有天地。”又《云韶集》：“东坡词摆脱羁缚，独往独来，虽有一二与调不合处，而风扬跋扈自足推到一时豪杰。”<sup>10</sup>

(七) 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曰：“词导源于诗，诗言志，词亦贵乎言志。淫荡之志可言乎哉？‘琼楼玉宇’，识其忠爱；‘缺月挂疏桐’，叹其高妙，由于志之正也。若绮罗香泽之态，所在多有，则其志可知矣。”<sup>11</sup>

(八) 唐圭璋在《从〈东坡乐府〉早看苏轼和农民的情谊》一文云：“他所作的（东坡乐府），内容广阔，气魄雄伟，语言朴素，一反过去绮罗香泽及离情别绪的局限，是宋词空前的划时代的革新，也是宋词进一步的发展。”<sup>12</sup>

---

<sup>8</sup>【金】元好问著：《新轩乐府引》，《遗山先生文集》卷三十六，《四部备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页19。

<sup>9</sup>【清】刘熙载著，唐圭璋主编：《词概》卷一，《艺概》，《词话丛编》，页3690。

<sup>10</sup>【清】陈廷焯著，唐圭璋主编：《词坛丛话》，《云韶集》卷二，《词话丛编》，页3721。

<sup>11</sup>【清】沈祥龙著，唐圭璋主编：《论词随笔》卷一，《乐志余集》，《词话丛编》，页4047。

<sup>12</sup>唐圭璋著：《从〈东坡乐府〉早看苏轼和农民的情谊》，转引自刘石著：《苏轼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页2。

然而，历来对苏轼的评价不仅如此，在上述众多的评价当中，有认为苏轼为词体的发展“指出向上一路”，也有认为苏轼“以诗为词”开创了横放杰出的豪放词风，而苏轼将那身世之慨融于词中，为词之境阔的创作引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新道路，于中秉持的创作理念即是“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并非无病呻吟，故腔中那份鹤立独行之气使苏轼之词，时而充满风扬跋扈之势，时而散发绮罗香泽之态。

1980年9月在苏轼故里四川省眉山县举办了第一届苏轼学术讨论会，有关苏轼研究的专著陆续出版：

朱靖华《苏轼新论》（齐鲁书社1983年出版）

颜中其《苏轼论文艺》（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谢桃枋《苏轼诗研究》（巴蜀书社1987年出版）

崔海正《东坡词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

冷成金《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学苑出版社2003年出版）

刘乃昌《苏轼文学论集》（齐鲁书社2004年出版）

中国人民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学苑出版社2004年出版）

有关苏轼的作品选注、评传也大量出版，其中有：

刘乃昌《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0年出版）

王水照《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

孔凡礼《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鄒同庆与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

王水照与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对于苏轼的文学研究呈现出丰富繁盛的局面。

20世纪以来，对苏轼词的研究能有几个方面：一为，苏轼词是否协律；二为，苏轼的“以诗为词”；三为，“豪放”词风及创立“豪放派”的问题；四是《念奴娇·赤壁怀古》的主题。<sup>13</sup>与此同时，对苏轼的人生观和文艺观皆有探讨，如唐玲玲在《寄我无穷境——苏轼贬儋期间的生命体验》中言：“苏轼的晚年，在穷独海外、人事断绝的瘴云蛮烟中，对自己‘一生凡九迁’的心路历程和心灵轨迹，作出总结，并升华为一种心理经验，一种实现自我的‘内在超越’的自由的精神境界。”<sup>14</sup>又如尚永亮与张娟在《孤鸿情节：观照苏轼其人其词的一个新视点》中

---

<sup>13</sup> 参见孙华娟著：〈20世纪关于苏轼词的论辩〉，黄淮学院主办：《天中学刊》，河南：驻马店黄淮学院天中学刊编辑部出版，2003，页60-65。

<sup>14</sup> 唐玲玲著：〈寄我无穷境——苏轼贬儋期间的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北京：北京学苑，2004，页89。

言：“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往往偏重于苏轼秉性中的乐天和诙谐，而忽视了他内心  
中沉重、悲苍的主要方面，这恐怕是一个误区。”<sup>15</sup>

近年来，有对苏轼多元的人生观及其文学创作影响的研究，如王水照《苏轼  
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从而引领出对苏轼人生思想的研究，通过对深刻影响苏  
轼人生观的“出入”、“生死”这两大人生课题的研究，阐明苏轼思想中儒、道、  
佛的多种因素，在其思想发展中产生的此消彼长与相辅相成，从而揭示出其丰富而  
独特的人生体验与人格精神。随着苏轼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将焦点着重于苏  
轼士大夫人格的研究上，如韩晓玲《试论东坡词的多重人格》；郑芳祥《出处死  
生：苏轼贬谪岭南文学作品主题研究》；张惠民和张进《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  
与文艺思想》一书对苏轼进退出处的深层困惑作了深入探讨；王启鹏、陈思君的  
《对士大夫传统人格的超越——论苏轼寓惠思想》一文对苏轼寓惠时期的人格进行  
了全面探究，犹是对其时入世与出世思想的纠结进行了认真分析。

九十年代以来，苏轼的多重人格为学术界所探讨，对于展示其丰富复杂的人格  
精神，探寻其对人生目的的理性思考，揭示其词作的深刻思想内涵，有着重要的参  
考性作用。

---

<sup>15</sup> 尚永亮、张娟著：〈孤鸿情节：观照苏轼其人其词的一个新视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  
《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页 352。

## 第二节：研究动机、范围、方法、目的、难题

这篇论文主要是以宋代一大文豪苏轼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而本文将以其词作为中心探讨的媒介，试图从词中一窥那饱经宦海风尘洗礼的苏轼隐含于词中的“心史”。苏轼一生奔走朝野之间，王水照先生将其一生经历归结为：在朝——外任——贬居的两大循环过程<sup>16</sup>，由此可知，苏轼坎坷的仕宦之路，是建立在徘徊于重用与责受之间所形成的。身为一位以儒家“经世济民”思想入世的士大夫，在报国无门之下的情怀，唯有籍词排解心中之愁，故以词作为切口较能贴近词人之心灵深处，以一窥苏轼在仕途失意之时，仍能固守独善其身的坚强意念。

在古典诗词中对“天涯”的概念所表达出来的主题色彩，有如晏殊：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sup>17</sup>

又如秦观：

梅英疏淡，冰澌溶泄，东风暗换年华。金谷俊游，铜驼巷陌，新晴细履平沙。长  
忆误随车。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乱分春色到人家。西园夜饮鸣

<sup>16</sup>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45。

<sup>17</sup> 【宋】晏殊著：〈蝶恋花〉，《二晏词》，台北：世界书局，1981，页152。

笳。有华灯碍月，飞盖妨花。兰苑未空，行人渐老，重来是事堪嗒！烟暝酒旗斜。但倚楼极目，时见栖鸦。无奈归心，暗随流水到天涯。<sup>18</sup>

再有柳永：

梦觉、透窗风一线，寒灯吹息。那堪酒醒，又闻空阶，夜雨频滴。嗟因循、久作天涯客。负佳人、几许盟言，便忍把、从前欢会，陡顿翻成忧戚。愁极，再三追思，洞庭深处，几度饮散歌阑，香暖鸳鸯被。岂暂时疏散，费伊心力。殢云尤雨，有万般千种，相怜相惜。恰到如今，天长漏永，无端自家疏隔。知何时、却拥秦云态，愿低帏昵枕，轻轻细说与，江乡夜夜，数寒更思忆。<sup>19</sup>

于词中所流露出的多是离愁别绪、无奈感慨的氛围。然此文将以鄒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出版）作为主要的研究依据，将收入于中所编年的两百九十二首词作一番整理与统计，在整理的过程中统计出苏轼在朝、外任、贬居所作之词量有很大的悬殊，同时由此找出在苏轼编年词中出现“天涯”或与之相近意之词，以文本研究的方法，探究苏轼词中“天涯”的寓意与“天涯”对苏轼一生的心历体悟，由此得出，于中所包含的不仅仅是离愁、别绪等五味杂陈的心理情愫，亦也包含了经由踏遍红尘历练而获得“何处无芳草”的人格精神素养。

---

<sup>18</sup>【宋】秦观著，唐圭章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望海潮四首·其三·洛阳怀古〉（梅英疏淡），《全宋词》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586。

<sup>19</sup>【宋】柳永著，唐圭章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浪淘沙〉（梦觉、透窗风一线），《全宋词》第一册，页33。

然而，当我在撰写这份论文的过程中所面对最大的问题，莫过关于苏轼的研究甚广甚多，在资料收集方面遇到重重的取舍决定，在众说纷纭的智者面前自身的位置显得更加微乎极微，即便如此，在资料中所看到的乃是别人眼中的苏轼，而唯有亲身研究与了解才能塑造出个人眼中的苏轼。故此，本文以“天涯”作为探讨苏轼的人生意义，即是试图通过对苏轼词的解读与分析研究，从而了解苏轼于“天涯”之际所抱持的人生意义，而苏轼尽其一生告知世人流放并非是一种伤。

### 第三节：简述论文章节设置

苏轼“以诗为词”的写作革新打破了词为小道的规范，摆脱传统对词的束缚，突破旧有词那“花间樽前”的题材定式，颠覆“词为艳科”的藩篱，将自身对于人生的体悟与反思引入词中，从而使词在题材内容上冲破狭隘于儿女私情的主题，提升至能作为“人生哲理”的载体，思考“人”在浩瀚天地间的生存价值，回应“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价值，使词的题材范围达到了“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的崭新面貌。然而，此文第一部分将着重叙述前人对苏轼词风与这一词体革新的贡献而作的评价，同时也回顾历来关于苏轼研究的境况，并且阐明此文的研究动机、范围、方法、目的与难题，最后简要的概括本文章节的设置。

而第二部分将着重谈论的是“词”这一小道的文体，经由苏轼注入新生命的诠释之后，而有了全新的蜕变。从苏轼的词中窥探其在人生各个不同阶段之时，所

抱持的人生价值观，而这一人生价值观乃基于苏轼那书香世家的涵养熏陶所凝汇而成，家学的陶养至关左右着苏轼入世的处世态度，除此，苏轼自身对儒、道、释三家思想的兼容在坎坷的仕宦之路上起着转捩点的作用。这两大要素对苏轼起着一生的影响，致使他如何从青年时期意气风发，至中年陷入消极再从低谷崛起乐观积极，直到晚年归属自我，并达至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

苏轼一生涉足官场，在朝在野，贬谪流放，在地方上任职比在朝任职的时间较为长，故他在地方上所写的词作数量多于在朝期间，这不外是地方上湖光山色的导因，另也是面对朝内党争倾轧，局势纷乱而无暇作词。基于现实的仕途命运与理想抱负相抵触，故而在苏轼的词中不乏流溢出人生感慨的叹息，甚是有感“世事一场大梦”的慨然，正如苏轼有言“诗是穷人物”<sup>20</sup>，故在外任与贬居时期之词中不论是心境或精神上皆表现出波澜起伏的悸动。在惠州、儋州时期乃是其暮年阶段，于惠州写下名作〈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sup>21</sup>

---

<sup>20</sup> “旧病应逢医口药，新妆渐画入时眉。信知诗是穷人物，近觉王郎不作诗。”见【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呈定国〉卷三十一，《苏轼诗集》第五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页1639。

<sup>21</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753。

“天涯何处无芳草”一句表达出在心境上遂豁达，但“多情却被无情恼”句表露了一片忠诚无人省。“天涯”这一词寄予了一种自身处境的“茫然”，与对前景的“未知”，不知何时才能结束这一“天涯之旅”。有鉴于此，为了解“天涯”这一词在苏轼词中的寓意是必要的，故本文第三部分将以鄒同庆与王宗堂所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为依据，针对苏轼编年词并一一罗列词中出现的“天涯”或与之相近意之词，运用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尝试性的作出一番分类分析，以得出在人生各个不同阶段中“天涯”对苏轼所包含的人生意义。

而第四部分则是着重谈论，续第三章在分析苏轼词中出现“天涯”之词时，所能注意的两个问题，并由此展开一番论述。

## 第二章：与时代巨轮密不可分的苏轼

在十九世纪时期，一位当代法国文学理论家与批评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于1967年提出一项“作者已死”的文学理论，强调解读文学文本的多元性，认为文本与作者之间应是存在着一种互不干涉的关系，使文本脱离与作者之间的联系，并且注重一切解析皆以文本为主轴中心。然而，若用这一以文本为全面中心的角度作为切口，毫不关注作者的方法，以一求探析苏轼作品中的深层内涵，此举并非能探究出个所以然，再者即便探索出作品中的情感蕴籍那也只是冰山一角。在此回忆道王水照先生在《苏轼评传》中有言“据说有一个德国教授为学生讲解柏拉图的学说，只说一句‘从前有个叫作柏拉图的人’，接着就进入学说的剖析，了不涉其时代与生平。倘用此法研究苏学，则无疑是竹篮打水。”<sup>22</sup>在苏轼的作品中多以贴近自然事物，也多有日常生活上所接触的景观，或有现实的人生感慨、社会的世态炎凉等，无一不入为苏轼创作的题材。鉴于此，为了解苏轼寄寓于词中的思想蕴涵，定当得知晓这一文士如何穿梭于当时代的巨轮之下，而此部分将着重叙述苏轼的家世背景，看周遭的亲人如何对苏轼起着耳濡目染的人格影响；再观苏轼如何运用丰富的学养与独立的思考立足于“士大夫”这一身份之上。

---

<sup>22</sup>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导言》，页4。

## 第一节：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sup>23</sup>，自号东坡居士<sup>24</sup>，家有兄弟三人，兄长苏景先早夭，弟苏辙。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卯时，诞生在眉山城内纱縠行的家宅<sup>25</sup>；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城，享年六十六<sup>26</sup>，赐谥文忠。其晚年不凡的艺术成就与人格养成，并包含儒、释、道三家思想于一身，于中与其家学陶养至关密切。

### 一、祖父苏序

据孔凡礼所著的《苏轼年谱》载：自苏轼而上五世祖皆不仕<sup>27</sup>，虽不读书却能耕藕以自足，仁爱乡里。于其父苏洵所作的《族谱后录下篇》有载关于苏轼祖父苏序的事迹：

---

<sup>23</sup> “字子瞻，一字和仲。”见【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页1117。

<sup>24</sup> “营东坡，马正卿为经纪之，作《东坡八首》。自是始号东坡居士，盖慕白居易而然。”见孔凡礼著：《元丰四年》卷二十，《苏轼年谱》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页508。实际上，苏轼别号甚多：“号东坡、东坡居士、老泉山人、铁冠道人、戒和尚、玉局老、眉阳居士、雪浪斋。人称无邪公、仇池翁、毗陵先生、泉南老人、水东老人、东坡道人、海上道人、苏仙、坡仙。赐谥文忠后，人复称以文忠。”见孔凡礼著：《宋仁宗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卷一，《苏轼年谱》上册，页2。

<sup>25</sup> “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卯时，生眉山县纱縠行。据《施谱》谓纱縠行为私第。”又见民国《眉山县志》卷五：“拨股祠。刘鸿典记云：眉城妙縠行有三苏祠，旧相传为三苏故宅，而州西七十里有拨股祠，亦相传为三苏故宅。”皆见孔凡礼著：《宋仁宗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卷一，《苏轼年谱》上册，页9。

<sup>26</sup> “丁亥（二十八日），卒。卒前思弟辙。诸子、维琳、钱世雄在侧。遗言葬汝州。……其卒也，四方震掉。”见孔凡礼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卷四十，《苏轼年谱》下册，页1418-1419。

<sup>27</sup> 孔凡礼著：《宋仁宗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卷一，《苏轼年谱》上册，页4-5。

先子少孤，喜为善而不好读书。晚乃为诗，能白道，敏捷立成。凡数十年得数千篇，上自朝廷郡邑之事，下至乡闾子孙畋渔治生之意，皆见于诗。观其诗虽不工，然有以知其表里洞达，豁然伟人也。性简易，无威仪，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与人交，无贫贱皆得其欢心。见士大夫曲躬尽敬，人以为谄。及其见田父野老亦然，然后人不以为怪。外貌虽无所不与，然其中心所以轻重人者甚严。<sup>28</sup>

又《师友谈记》曾引苏轼语，言祖父苏序：

甚英伟，才气过人，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顷年在乡里郊居，陆田不多，惟种粟。及以稻易粟，大仓储之，人莫晓其故。储之累年，凡至三四千石。会眉州大饥，太傅公即出所储，自族人，次外姻，次佃户、乡曲之贫者，次第与之，皆无凶岁之患。或曰：“公何必粟也？”“惟粟性坚。能久，故可广储以待匮而。”又绕宅种芋魁，所收极多，即及时多盖薪蔭，野民乏食时，即用大甑蒸之，罗置门外，恣人取食之，赖以无饥焉。<sup>29</sup>

苏轼祖父苏序，字仲先，生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而卒于庆历七年（1047）。<sup>30</sup>综上所述苏序不止是为具有仁厚的长者，且敏捷能诗，为人通达不羈，与人交往不论贵贱，甚为田父野老所敬重，处理事情轻重严明，乐善好施，助

<sup>28</sup>【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族谱后录下篇〉卷十四，《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页386。

<sup>29</sup>【宋】李廌著，孔凡礼点校：《师友谈记·东坡言先祖太傅公事》，《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页38-39。

<sup>30</sup>“先子讳序，字仲先，生于开宝六年，而歿于庆历七年。娶史氏夫人，生子三人，长曰澹，次曰涣，季则洵也。”见【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族谱后录下篇〉卷十四，《嘉祐集笺注》，页386。

人为乐，行义于乡里，对世事有一番自己的见解，更具有忧患意识。上述两项资料皆记载“喜为善而不好读书”、“虽不读书，而气量甚伟”，可以说明苏序的性格乃是天性的使然，而非经由后天饱读诗书孕育而生。

于此不难察觉，苏轼遗传到了祖父这些良善的行为与个性，这在苏轼入仕之后任地方官时竭尽心力造福百姓的政绩上已作出了一番很好的体现。如元祐年间（1089），苏轼于杭州任太守，为人民饘粥施舍灾民、建造病坊、配置良药、延请良医分坊为民治病<sup>31</sup>，贮粮防饥<sup>32</sup>；又勘察西湖地形，设计开河浚湖，兴建水利，民众得以溉田千顷<sup>33</sup>。同时苏轼又建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用；取湖内淤泥，筑起南北直径三十里的一条长堤（人称苏公堤），并在堤上造桥六座，置九亭，使人民的耕作和行旅更加方便<sup>34</sup>。然而，于庆历七年（1047），祖父苏序卒于家中，享年七十五，时苏轼年十二岁，祖父的言教、身教，在苏轼幼稚的思想阶段，存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家风的习染，使得苏轼自幼便积累了一定的涵养与开阔的襟抱、仁厚的胸怀，这让苏轼在面对日后坎坷的仕途道路时，为脆弱的心灵预先设下了一面坚实的盾牌。

---

<sup>31</sup> “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挾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见【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1122。

<sup>32</sup> 详见【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卷三十一，《苏轼文集》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882-883。

<sup>33</sup> 详见【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卷三十，《苏轼文集》第三册，页863-864。

<sup>34</sup> 详见【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卷三十，《苏轼文集》第三册，页866-867。又见【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1122-1123。

## 二、二伯父苏涣

苏序有三子，长子苏澹早逝、次子苏涣、三子苏洵。于中第二子苏涣（1000-1062），字公群，晚字文父<sup>35</sup>。在天圣二年因乡试中举，以进士得官，乡里皆喜，苏轼对此事追忆道“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观者塞涂”<sup>36</sup>；苏辙也有所道“乡人皆喜之，迓者百里不绝”<sup>37</sup>。除此，两兄弟还认为这二伯父的高中具有广大的意义，苏轼〈苏廷评行状〉云：

闻之，自五代崩乱，蜀之学者衰少，又皆怀慕亲戚乡党，不肯出仕。公始命其子涣就学，所以劝导成就者，无所不至。及涣以进士得官西归，父老纵观以为荣，教其子孙者皆法苏氏。自是眉之学者日益，至千余人。<sup>38</sup>

苏辙〈伯父墓表〉亦云：

苏氏自唐始家于眉，阅五季皆不出仕。盖非独苏氏也，凡眉之士大夫，修身于家，为政于乡，皆莫肯仕者。<sup>39</sup>

---

<sup>35</sup> “公讳涣，始字公群，晚字文父。”见【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伯父墓表〉，《栾城集》卷二十五，《苏辙集》第二册，页414。

<sup>36</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谢范舍人书〉卷四十九，《苏轼文集》第四册，页1425。

<sup>37</sup> 【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伯父墓表〉，《栾城集》卷二十五，《苏辙集》第二册，页414。

<sup>38</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廷评行状〉卷十六，《苏轼文集》第二册，页497。

<sup>39</sup> 【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伯父墓表〉，《栾城集》卷二十五，《苏辙集》第二册，页414。

曾巩受苏轼兄弟之托为祖父苏序做的墓志铭亦有所载：

蜀自五代之乱，学者衰少，又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君独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甚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其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sup>40</sup>

由此可见，他们认为唐末以至五代，中原动乱，兵戈不息，然西蜀地处偏僻，稍为安定，士人安其乡里，皆不愿出仕，然唯苏序教子读书求仕，而光耀家门，以致乡人纷纷效仿，从而眉州苏氏出仕始于苏涣，苏涣不仅影响苏氏一门，甚至影响一乡风气。然而，关于眉州的学风与仕风由苏涣开启一说已有学者考究而出并非如此<sup>41</sup>，两兄弟对二伯父中举之事甚是夸大其辞，但此也实属出于后辈对长辈的敬仰与尊崇。

当苏轼祖父辞世的那年，二伯苏涣归家服丧，于家中日子时常勉励苏轼兄弟努力向学<sup>42</sup>：

予少而读书，师不烦。少长为文，日有程，不中程不止。出游于涂，行中规矩。

入居室，无惰容。非独吾尔也。凡与吾游者举然。不然，辄为乡所摈曰：“是何名为

---

<sup>40</sup>【宋】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卷四十三，《曾巩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587。

<sup>41</sup> 参见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50-53。

<sup>42</sup> “伯父涣自京师奔丧回至蜀中。与弟辙深受涣教益。”见孔凡礼著：〈宋仁宗景祐三年至皇祐五年〉卷一，《苏轼年谱》上册，页22。

儒？”故当是时，学者虽寡，而不闻有过行。自吾之东，今将三十年，归视吾里，弦歌之声相闻，儒服者于他州为多，善矣。尔曹才不逮人，姑亦师吾之寡过焉可也。<sup>43</sup>

苏涣不仅指导他们读书学习，对苏轼日后为官态度亦影响深远。于嘉祐五年（1060），苏轼年二十五岁，初入政坛，曾问与伯父苏涣关于为政之方：

颖滨（弟苏辙）尝语陈天倪云：亡兄子瞻及第调官，见先伯父，问所以为政之方。伯父曰：“如汝作《刑赏忠厚论》。”子瞻曰：“文章固某所能，然初未尝学为政也，奈何？”伯父曰：“汝在场屋，得一论题时，即有处置，方敢下笔，此文遂佳。为政亦然。有事入来，见得未破，不要下手；俟了了而后行，无有错也。”至今以此言为家法。<sup>44</sup>

由是可观，这位二伯苏涣不论面对为学或作官的态度都为苏轼产生了一种启迪性的作用。

### 三、父亲苏洵

无论是祖父苏序抑或二伯父苏涣这两人在苏轼心中种下的为人处事的态度、为学作官的态度都为苏轼铺好了一条走向积极人生的康庄大道，而苏轼的父亲方才正

---

<sup>43</sup>【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伯父墓表》，《栾城集》卷二十五，《苏辙集》第二册，页417。

<sup>44</sup>【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卷二，《苏轼文集》第一册，页33-34。

是带领着他走上这条康庄大道的灵魂人物。苏洵，字明允，好老泉，生于宋真宗祥符二年（1009），卒于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享年五十八。<sup>45</sup>十九岁时娶同县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为妻，二十五岁之前，苏洵遍游各地，曾自述道：

少年喜奇踪，落拓鞍马间。纵目视天下，爱此宇宙宽。<sup>46</sup>

苏轼一生重视生活，热爱大自然，欣喜登山临水走马探险，想必得其父的引领不少，于〈书晁说之考牧图后〉一诗曾云：

我昔在田间，但知羊与牛。川平牛背隐，如驾百斛舟。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不知。前有百尾羊，听我鞭声如鼓鼙。我鞭不妄发，视其后者而鞭之。泽中草木长，草长病牛羊。寻山跨坑谷，腾趯筋骨强。<sup>47</sup>

如此对田野山水的挚爱使得苏轼即便被贬谪于岭南之后，在人生遭受重大困顿时，心灵也能得以寄寓于其中聊以慰藉，同时能乐观疏达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

苏洵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散文方面，尤长于策论，其文深受孟子、荀子、战国策影响，其笔力健劲，苏洵虽不以诗见长，但其文学思想、治学方向、审美观

---

<sup>45</sup> “曰苏君，讳洵，字明允。”见【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卷三十五，《欧阳修全集》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512。

<sup>46</sup>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忆山送人〉卷十六，《嘉祐集笺注》，页452。

<sup>47</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书晁说之《考牧图》后〉卷三十六，《苏轼诗集》第六册，页1966-1967。

念等皆对苏轼有着深刻的影响。苏洵于庆历年间因屡次进京应试求官的失败而兀然醒悟，欧阳修曾述苏洵早年读书的状况与成就道：

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馀，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材异等，不中。退而叹曰：“此不足为吾学也。”悉取所为文数百篇焚之。益闭户读书，绝笔不为文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笔顷刻数千言，其纵横上下出人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盖其稟也厚，故发之迟，志也慤慤，故得之精。<sup>48</sup>

因两番落榜而痛下决心绝意功名也不再出蜀游玩，在家著书立说陆续著成《衡论》、《洪范论》、《史论》等著作成为自成一家的学者，同时也倾注心力于两个儿子的教育，以其“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出处之际，得其粹精，涵蓄充溢，抑而不发”的博厚学养为基础，潜心教导二子，使得二人于出仕之前，涉猎极为广泛，经史子集，无所不攻，同时苏轼也秉承了父亲独立思考的性格，因父亲对儿子极为严格的教育，苏轼曾于诗中云：

夜梦嬉游童子如，父师检责惊走书。计功当毕春秋馀，今乃粗及桓、庄初。怛然悸寤心不舒，起坐有如掛钩鱼。我生纷纷婴百缘，气固多习独此偏。弃书事君四

---

<sup>48</sup>【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卷三十五，《欧阳修全集》第二册，页513。

十年，仕不顾留书绕缠。自视汝与丘孰贤，《易》韦三绝丘犹然，如我当以犀革编。<sup>49</sup>

父亲严责督学，让时过四十年的苏轼于儋州无事中梦及这段少年往事，而忽感胆战心惊，由此可想苏洵在儿子心中之严父形象。在如此严格的家庭教育之下成长，奠定苏轼一生学问的基础，除了祖父厚实的人格熏陶；二伯父认真为学作官的态度感染；还秉承父亲苏洵在文学创作上的想法，《南行集》中，即可看出苏洵对苏轼文学观影响的痕迹：

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sup>50</sup>

苏轼认为文学源自生活，而优秀的文学作品不是“能为之”而是“不能不为之”的产物，如同山川兴云起雾，草木开花结果，皆是由内充实而然于外部，即是苏轼强调创作必须深入生活，经由对生活有所体悟、感动而方能创作出好文章，而非勉强为之。苏轼这一重要文学思想受教于他的父亲苏洵，这也为他确立了个人对于创作的指标。于嘉祐二年（1057），苏洵带着二子参加科举考试，双双中举，苏轼更是深受主考官欧阳修及参详官梅尧臣的大力赏识，欧阳修在他众多的门生当中尤为欣赏苏轼，曾对梅尧臣说道：

---

<sup>49</sup>【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夜梦并引〉卷四十一，《苏轼诗集》第七册，页2251-2252。

<sup>50</sup>【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南行前集叙〉卷十，《苏轼文集》第一册，页323。

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sup>51</sup>

由是可观欣赏之情溢于言表，然苏轼也借由这一场科举考试而名震京师，至此开启了苏轼的宦宦生涯，但惋惜之极的是苏轼母亲未能得到二子进士及第的消息便与世长辞了。

#### 四、母亲程夫人

于宝元元年（1038）父亲开始走上求仕之路期间皆由母亲一力承担对二子严格的家庭教育，故轼、辙两人自小养成阅读的习惯，奠定严谨与丰厚学识的根基。程夫人尤重历史教育，因以史实为教材不仅能启迪智慧亦足以陶冶性情，健全人格，培养辨别是非之能力。<sup>52</sup>而苏轼曾读《范滂传》，范滂为东汉人：

少厉清节，为州里所服，……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建宁二年，遂大诛党人，诏下急捕滂等。……即自诣狱。……其母就与之诀。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

<sup>51</sup>【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与梅圣俞〉卷六，《欧阳修全集》第六册，页2459。

<sup>52</sup> 参见【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张侍郎书第一书〉卷十二，《嘉祐集笺注》，页346。

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顾谓其子曰：“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行路闻之，莫不流涕。时年三十三。<sup>53</sup>

苏轼读完深受感动，苏辙曾有下列记载：

公生十岁，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故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sup>54</sup>

程夫人以直臣名士为教材，教子应抱“奋励有当世志”的精神，故苏轼即使在岭南的困厄环境中仍能坚守志节，可见母亲对苏轼所渲染的人格节操至深，苏轼以范滂为典型，正直不阿，怀抱如此人生观的苏轼，在四十年左右的从政生涯中其信念与处事态度乃是致使苏轼“一肚子不合时宜”<sup>55</sup>的原因。

---

<sup>53</sup> 【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党锢列传第五十七〉卷六十七，《后汉书》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页2203-2207。

<sup>54</sup> 【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1117。

<sup>55</sup> 参见明人曹臣所编《舌华录》载。又见袁中道《次苏子瞻先后事》。转引自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

## 第二节：奋励治仕

苏轼一生以一种兼容并包的态度，吸纳与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苏辙对苏轼之学有云：

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sup>56</sup>

由此可知，苏轼青年时期专注于治平功业之事，故好贾谊、陆贽之书为究治乱之由，重在实用之学，不谈空言之术、无用之学，然而，苏轼性格却近与庄子之思，如是可观，青年时期的苏轼已即儒道互补，以儒学为治世之术，同时以庄子之学为己好。然而，中年时期的苏轼在贬谪黄州期间，于忧患之中受佛家影响，由庄入佛，于此，苏轼兼取儒家积极用世的思想，将道家避世、佛家超世的思想转化而为建构起自己卓然独立并充满积极的人格。至晚年时期的苏轼流放于惠州、儋州，以“超然独立自主”为人生价值终极的指标。

---

<sup>56</sup>【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 1126-1127。

## 一、青年意气风发积极进取——“致君尧舜，此事何难”

苏轼自小就深受长辈们的耳濡目染，承蒙书香世家的家庭教育而甚有儒家经世济民的思想，苏轼少时读《范滂传》致使立志做个为求真理不惜杀身成仁之士。基于这样的思想使苏轼立下凌云之志，抱有高远之怀，将人生视点聚焦于现实社会生活上，苏轼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阐明自己希图以仁德治理国家的思想：

古者赏不以爵禄，刑不以刀锯。赏以爵禄，是赏之道，行于爵禄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禄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锯，是刑之威，施于刀锯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锯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胜赏，而爵禄不足以劝也，知天下之恶不胜刑，而刀锯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sup>57</sup>

苏轼从奖赏和刑罚的现实层面上而论，将之最终归咎于君主必须施行仁德之政才能“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苏轼即是秉持如此积极用世的精神踏上他的宦海之路。时值嘉祐六年（1061），苏轼为凤翔一职尽心尽力“长吏意公文入，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sup>58</sup>并且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以针砭时弊的理念写下〈二十五策〉，表达朝廷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及其原因，从而荐举自己的革新主张。除此，苏轼还直言向君主进谏道：“‘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

<sup>57</sup>【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卷二，《苏轼文集》第一册，页33。

<sup>58</sup>【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37。

广，进入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sup>59</sup>这时期的苏轼怀有满腔经世济民的热血，积极投入政事，直道而言。苏轼有〈沁园春〉一词：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摘锦，朝露溥溥。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sup>60</sup>

傅藻《东坡纪年录》载：“熙宁七年甲寅，十月赴密州，早行马上作《沁园春》。”<sup>61</sup>“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句，表达出初出茅庐那豪言壮语，恃才傲物的性格，亦表现出“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心理，然而“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却已微显与时世格格不入之思想，形成了前后顿挫的矛盾，对这句有一段有

---

<sup>59</sup>【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1118。

<sup>60</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残灯），《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134-135。

<sup>61</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残灯），《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135。

趣的记载：“神宗闻此词，不能平，乃贬坡黄州，且言：教苏某闲处袖手，看朕与王安石治天下。”<sup>62</sup>然而，依宋神宗对苏轼的佳赏，此言实为气话。

然而，苏轼却与王安石所倡导的变法主张在某些意见上有所分歧，从而发表反对声浪，随即引起朝中支持变法的大臣的不满，苏轼自知此地不留人便自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二年（1079）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与湖州知州。苏轼在杭州协助知州修复钱塘六井<sup>63</sup>；在密州遇上严重蝗灾<sup>64</sup>，一面上奏朝廷要求蠲免秋税，一面领头节俭，最终所获幸存达千人<sup>65</sup>；在徐州遇黄河决堤，水患忧扰，组织抗灾，筑堤护城<sup>66</sup>。在地方上的苏轼并未因远离中央而疏于关心朝政的情况，在外任职期间仍大力著述以捍卫自己所尊崇的信念，在徐州时写下〈日喻〉一文为制衡王安石所倡导的“新学”。当时苏轼将〈日喻〉一文送人进京应试，此文主旨在于强调“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槃。”扣槃而得其声，

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扞烛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为

---

<sup>62</sup>【金】元好问著：《遗山集》卷三《东坡乐府集引》。见于参考资料，鄒同庆、王宗堂著：〈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残灯），《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137。

<sup>63</sup> 详见【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钱塘六井记〉卷十一，《苏轼文集》第二册，页379-380。

<sup>64</sup> 详见【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次韵章传道喜雨〉卷十三，《苏轼诗集》第二册，页622-623。又见【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上韩丞相相论灾伤手实书〉卷四十八，《苏轼文集》第四册，页1395-1396。皆提及为防御蝗灾之难的情形。

<sup>65</sup>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事见【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与朱鄂州书〉卷四十九，《苏轼文集》第四册，页1417-1418。

<sup>66</sup> 徐州救灾事详见【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1119-1120。

日也。……南方多没水，日与水居也。……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者以经术取士，士求道而不务学。<sup>67</sup>

籍此阐明“学”与“道”的关系，文章旨在说明求知不可像眇者猜日，脱离实际，自以为是，而应像南方之人“日与水居”那样，从学习和实践中求得真知。于此抨击“士之求道而不务于学”的世风，即是反对在经传注疏中做蠹虫，主张从实践中学习。<sup>68</sup>而意谓“新学”所定于准则的“道”是不能代替每个人独立钻研、体会、实践之“学”的。<sup>69</sup>

苏轼在地方任上八年期间不仅尽心尽职为民服务，同时亦致力于文艺方面的活动，杭州西湖的山水、钱江的潮汛为他提供了丰富的诗词题材<sup>70</sup>。元丰元年（1078）苏轼在徐门石潭谢雨，于道上作词：

照日深红暖见鱼。连溪绿暗晚藏乌。黄童白叟聚睢盱。麋鹿逢人虽未惯，猿猴闻鼓不须呼。归家说与采桑姑。<sup>71</sup>

<sup>67</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日喻〉卷六十四，《苏轼文集》第五册，页1980。

<sup>68</sup> 马瑞芳著，周先慎主编：〈日喻〉，《苏轼散文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页251-258。

<sup>69</sup>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82。

<sup>70</sup> 据朱孝臧《疆屯丛书》本《东坡乐府》，第一首编年词为《浪淘沙·昨日出东城》，作于熙宁五年时在杭州。近有学者考证，苏轼在此前已有词作，但尚难论定。参见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80。

<sup>71</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其一〉（照日深红暖见鱼），《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30。

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挨踏破箬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sup>72</sup>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麩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sup>73</sup>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谩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sup>74</sup>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sup>75</sup>

以上作于徐州太守任上，时值久旱，身为父母官的苏轼至石潭祈神求雨，果真应验遂人所愿，事后作词五首，每一首可视为一幅幅古朴质野的民俗风景画，同时亦是苏轼忧民之忧、乐民之乐思想的体现。而最后一首从思想内容上能看作是苏轼这次走访农村农事活动的一个总结：面对这么一副田园风光、淳朴自适的生活氛围，不

---

<sup>72</sup> 鄮同庆、王宗堂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其二〉（旋抹红妆看使君），《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32。

<sup>73</sup> 鄮同庆、王宗堂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其三〉（麻叶层层苘叶光），《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33。

<sup>74</sup> 鄮同庆、王宗堂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其四〉（簌簌衣巾落枣花），《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35。

<sup>75</sup> 鄮同庆、王宗堂著：〈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其五〉（软草平莎过雨新），《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37。

禁让苏轼产生“使君元是此中人”的醒悟。然而，这醒悟也即是对自己所经历的仕宦之路的反省：

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馀。卧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

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sup>76</sup>

词中谈及为官的心得，而一句“占得人间一味愚”写出了苏轼此时对功名利禄的态度——“愚”，经多年于宦海中打滚而有所此得。因早年自视过高，一味图得功成名就，而对于权术之计愚昧不堪，也道出了其自知自明之处，深有不合时宜之慨然，即便不断求进求取，但世事却常与愿违。

## 二、中年仕途坎坷豁达乐观——“也无风雨也无晴”

然而，苏轼一生在政治上遭遇两大磨难，几与死神擦肩而过：一为“乌台诗案”<sup>77</sup>被贬谪黄州；二为被视作“元祐党人”而流放天涯海角。然而，前者致使苏轼惹上牢狱之灾、杀身之祸，几欲就死：

---

<sup>76</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南乡子·自述〉（凉簟碧纱厨），《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43。

<sup>77</sup>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御史台是现在中央政府的检察院，主要负责纠察官员。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李定等人将苏轼逮捕下狱，严加审理，要将他置之于死地；同时还抓三十多个和他有书信往来、并批评过朝政的官员，酿成中国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但李定等人罗列的罪证，实在是难以成立，就连皇帝也不太相信；再加上苏轼的才名太盛，许多有地位声望的人出面救他。结果，苏轼获释出狱，前后被关达五个月。

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sup>78</sup>

这对苏轼的入世信念与不拘时节的自然性格起着莫大的影响，让苏轼的精神世界陷入低靡与无助，为平抚伤创的心灵，致使他重新思考安身立命之计，亦改变了其人生态度以面对接踵而至的不幸事态。通过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思索与体悟，将人生态度提升至淡薄名利、顺其自然，随遇而安。

元丰三年（1080），苏轼初到地处偏僻的黄州，其时生活境况困顿：

初到黄，廩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sup>79</sup>

又记：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sup>80</sup>

<sup>78</sup>【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1120。

<sup>79</sup>【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答秦太虚书第四首〉卷五十二，《苏轼文集》第四册，页1535。

这无疑对颇好喜与人交往的苏轼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空虚与心灵上的折磨。初到黄州时的苏轼陷入消沉、彷徨、愤懑，满腔壮志却报国无门，甚是予以莫须有之罪诬陷入狱，深受人格的侮辱，危临死地。在严酷的政治打击下，由生极端的孤寂、忧闷和痛苦，而〈卜算子〉一词写出他当时的愁苦：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sup>81</sup>

黄山谷评此词为：“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是。”<sup>82</sup>词中的孤静、清寒、寂寞、无助的意境，乃是词人心境的真实写照，犹如〈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sup>83</sup>

以雪的清白隐喻诗人自身的高洁，表达个人情怀：世人皆浊我独清，独善其身的精神状态。词中“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也正是词人在理想

---

<sup>80</sup>【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答李端叔书〉卷四十九，《苏轼文集》第四册，页1432。

<sup>81</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75。

<sup>82</sup>【宋】黄庭坚著：《山谷集·跋东坡乐府》。见于校勘，鄒同庆、王宗堂著：〈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76。

<sup>83</sup>【唐】柳宗元著：〈江雪〉卷四十三，《柳宗元集》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1221。

无法实现的苦闷与忧愁，人生的虚幻不定和难以预料，对不平现实的无奈和愤怒，所表现出人格的孤傲和失落。甚是以“红梅”自喻：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  
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  
枝。<sup>84</sup>

词中强调两点：其一乃不合时宜，因其绽放之时非于百芳争艳之春，亦非万物茂盛之夏，也非硕果累累之金秋，而偏是万籁寂静、万物凋零之冬，突显出铮铮之傲骨与斗志；其二乃不随流俗，正因红梅不与群芳争艳，才成就它那超尘拔俗的品格。如此吟咏红梅之形象，其实也借此说明了孤芳自赏的心理因素。

面对党争间讥轧的迫害，莫须有之罪的冤害，身处偏远之地的落寞，壮志未酬的挫折，这些心理压力不间断的消磨这位仕人的心智，孤苦无依之际，希图寻找可依靠之处，于〈南歌子〉词云：

寸恨谁云短，绵绵岂易裁。半年眉绿未曾开。明月好风闲处、是人猜。 春  
雨消残冻，温风到冷灰。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sup>85</sup>

<sup>84</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定风波·咏红梅〉（好睡慵开莫厌迟），《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462。

<sup>85</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南歌子·感旧〉（寸恨谁云短），《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86。

词中言因自己受诬入狱遭贬，此绵绵细流的恨意难以磨灭，劫后半年的时间内，苏轼爱妾王润之为之忧心忡忡眉头深锁。<sup>86</sup>而今“诗案事件”已成往事，犹如春雨消融残留的寒冻，而已灰的心与已冷的意，却因温风的到来得以复苏。苏轼深切感知人生无常须及时行乐，而感念得以再与亲人挚爱相聚。此时的苏轼一心只期望与亲人聚首：

风迴仙驭云开扇。更阑月墜星河转。枕上梦魂惊，晓檐疏雨零。相逢虽草草。长共天难老。终不羨人间，人间日似年。<sup>87</sup>

此为苏轼与妻子重聚后感怀而作，劫后余生所笼罩的阴影，不时潜入梦中惊魂，在惶惑之中只求与挚爱长相厮守。“终不羨人间，人间日似年”二句，真切地表露出夫妻间的情谊，以及苏轼内心的脆弱与孤寂。

初到黄州的苏轼于心境上虽表现出的是消极与迷茫，然这样的阴霾并未一直伴随着苏轼：

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尘世难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sup>88</sup>

<sup>86</sup> 参见鄒同庆、王宗堂著：〈南歌子·感旧〉（寸恨谁云短），《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87。

<sup>8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菩萨蛮·七夕黄州朝天门上二首·其二〉（风迴仙驭云开扇），《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93。

“尘世难逢开口笑”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而“登临不用怨斜晖”因了解“古往今来谁不老”故“牛山何必更沾衣”，便无需执着非人事能力所及之事。然而，苏轼之所以得以调节内在与外部之间的矛盾，其主要的因素在于自身对佛家思想的融汇，于〈黄州安国寺记〉一文云：

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有茂竹修林，陂池亭榭。间一二月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sup>89</sup>

苏轼通过“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将精神置空于现实世界之外，免于种种的尘世干扰，而达至“物我相忘，身心皆空”，在澄坐中让心灵得以获得安定与清静。苏轼有两首颇富禅机韵味的词作：

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sup>90</sup>

---

<sup>88</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定风波·重阳括杜牧之诗〉（与客携壶上翠微），《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95。

<sup>89</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黄州安国寺记〉卷十二，《苏轼文集》第二册，页 391-392。

<sup>90</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如梦令·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其一〉（水垢何曾相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546-547。

自净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  
为人间一切。<sup>91</sup>

两首皆有语意双关，借揩背、澡浴表明自身的清与净，无论政敌如何打压、讥讽、诬陷，词人扪心自问本来无一垢，何处需揩拭。然而，苏轼对佛家思想的参与非欲诚心遁入空门：

若世之君子，所谓超然玄悟者，仆不识也。往时陈述古好论禅，自以为至矣，而鄙仆所言为浅陋。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sup>92</sup>

苏轼将佛禅之道喻为“龙肉”，而将自学佛禅之理喻为“猪肉”，如此相较之，前者为凡夫俗子皆向往之稀世珍宝，而后者仅为伸手即可果腹之食，故苏轼对佛家思想的专研只意寻找一种调节心理、纾解精神压力，于精神上得以解脱的方法，疗慰在人世间的苦痛。

在体认了人生的无常与世态炎凉，并从佛家思想中寻求精神的解脱与平衡之后，开始反思自己过往的人生价值观：

---

<sup>91</sup> 鄮同庆、王宗堂著：〈如梦令·元丰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浴泗州雍熙塔下·其二〉（自净方能洗彼），《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549。

<sup>92</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答毕仲举书〉卷五十六，《苏轼文集》第四册，页 1671-1672。

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讪讪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滴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sup>93</sup>

此时的苏轼已年过四十，回首当时入世的观念将之视为“病”，彻底否认故我，重视今我。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宋诗概说》序言：“宋诗好谈哲学道理，……这种达观的态度产生了对人生的新看法，……新的人生最大的特色是悲哀的扬弃。”<sup>94</sup>然用之于苏词不外如是。因对自身的人生价值观的顿悟，才能令自己于困厄中采取一种随遇而安的态度：

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sup>95</sup>

几经冥思对现实的生活状态，并从陶渊明身上看到了另一番生活趣味，而这一生活景象成为苏轼“吾老矣，寄余龄”心之向往的乐园。由此可观，唯有对人生与生命

---

<sup>93</sup>【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答李端叔书〉卷四十九，《苏轼文集》第四册，页1432-1433。

<sup>94</sup>【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宋诗概说》，香港：香港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页26。

<sup>95</sup>鄒同庆、王宗堂著：〈江城子·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梦中了了醉中醒），《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352-353。

的深刻重视才能使人于逆境中求变，苏轼为排解困境而选择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也从而塑造出苏轼那兼容多家思想的人格形象。在大悟之后的苏轼，于词作的风格逐渐有所改变，而苏轼那“竹杖芒鞋”的士大夫形象也油然而生：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sup>96</sup>

此词乃苏轼贬谪黄州第三年（1082）所写，词中风格一反初到黄州时期的消极神态，语气豪迈，词人竹杖芒鞋，冲风顶雨，从容前行。看似篇记游，然却隐含着一番自己的人生见解，由眼前的风雨景象推及人生世态，表现出面对人生风雨亦能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胸襟情怀。于中还带有语意双关，以不畏自然风雨，表达对外来势力所施加的打压与迫害的藐视。下片道出了词人从大自然微妙的变化中所获得的顿悟与领略：风雨阴晴的变化无常，恰如人生高潮迭起的波折。纵观全词，轻松淡雅、悠然自适，而苏轼之能有如此处变不惊的态度，乃是在历经人间崎岖、久经艰难世路中磨练出来的，这首词也昭示着，经过痛苦的思想蜕变与精神挣扎之后，已化解了初期的抑郁，从而达至另一种新的精神境界。

---

<sup>96</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莫听穿林打叶声），《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356。

继看〈浣溪沙〉：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 谁道人生无再少？

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sup>97</sup>

关于这首词的写作背景，苏轼自己有段记述：“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曰螺师店，予买田其间。（余）因往（沙湖）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sup>98</sup>苏轼本已代罪之身又逢病魔缠身，情绪低落不在话下，在大病初愈，恰逢清泉寺的清幽和静谧、柔嫩的兰草、清澈的溪水、洁净的沙道、绵绵的细雨、脆亮的鸟鸣，令人犹如置身于红尘之外，脱尘超俗之地，兴致盎然，也无需叹老哀衰，应当乐观向上，享受现世，表现出虽处困境，仍力求振作的精神。又看〈哨徧〉：

为米折腰，因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皆非今是。

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

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返，本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

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

<sup>9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山下兰芽短浸溪），《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358。

<sup>98</sup> 【宋】苏轼著，王松龄点校：《东坡志林·游沙湖》卷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页 2。

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  
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sup>99</sup>

<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旧好咏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  
增损，作《般涉调哨徧》，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sup>100</sup>然而，陶渊明之长乃  
是士大夫于矢志或浊世之下，如何善处自身的问题。《论语》载：“邦有道，则  
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sup>101</sup>、“用之则行，舍之则藏”<sup>102</sup>，《孟子》：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sup>103</sup>在这一点上陶渊明的处世态度较为后世文  
人所追慕之，以其<归去来辞>而言，后人或有追和或有隐括，如秦观有<和渊明归  
去来辞>：

归去来兮，眷眷怀归今得归。念我生之多艰，心知免而犹悲。天风飘兮余迎，海  
月炯兮余追。省已空之忧患，疑是梦而复飞。及我家于中途，儿女欣而牵衣。望松楸  
而长恸，悲心极而更微。<sup>104</sup>

然此非单纯的游戏文字或是模仿，而是对其思想情趣的再诠释。故此，面对云云浮  
华虚名、蝇头小利也无需挂齿：

<sup>99</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哨徧〉（为米折腰），《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388-389。

<sup>100</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卷五十九，《苏轼文集》第四册，页 1789。

<sup>101</sup> 程树德著，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卫灵公上〉卷三十一，《论语集释》第四册，页 1068。

<sup>102</sup> 程树德著，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述而上〉卷十三，《论语集释》第二册，页 450。

<sup>103</sup> 【清】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尽心上〉卷二十六，《孟子正义》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 891。

<sup>104</sup> 【宋】秦观著，徐培均笺注：〈和渊明归去来辞〉卷一，《淮海集笺注》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页 30。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  
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 思量。能几许，忧愁风  
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  
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sup>105</sup>

对此词《玉林词选》云：“东坡《满庭芳》词一阕，碑刻徧传海内，使功名兢进之徒读之可以解体，达观恬淡之士歌之可以娱生。”<sup>106</sup>唯有在剥脱了于凡尘间的名利胜败，才能拥抱“清风”、“皓月”、“千钟”、“美酒”、“琴乐”那般令人自得写意的生活享受。

于黄州时期的苏轼其思想活动波澜起伏，而最为激荡其心智的人生问题便是在“入世”与“出世”间的挣扎。苏轼期许如同陶渊明归隐山林，度过“躬耕自资”的生活：

倾盖相逢胜白头。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 卖剑买牛吾欲老，  
乞浆得酒更何求？愿为祠社宴春秋。<sup>107</sup>

<sup>105</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满庭芳〉（蜗角虚名），《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458-459。

<sup>106</sup> 【元】陈秀明著《东坡诗话录》引《玉林词选》。见于参考资料，鄒同庆、王宗堂著：〈满庭芳〉（蜗角虚名），《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461。

<sup>10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浣溪沙·自适〉（倾盖相逢胜白头），《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478。

“菟裘”出于《左传·隐公十一年》：“使营菟裘，事将老矣。”<sup>108</sup>后因以称告老退隐的居处，将故乡之外的告老归隐之地称为菟裘。当苏轼下定决心之后，却好景不长：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  
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  
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翦柔柯。仍传  
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sup>109</sup>

《序》云：“元丰七年四月一日，余将自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会李仲览自江东来别，遂书以遗之。”<sup>110</sup>本想终老异乡，却身不由己，朝命难违，发出“归去来兮，吾归何处”的感慨、无奈之音。然而，在他的《定风波》中写出了在出世与入世的矛盾间取得一种平衡：

谁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  
乡。<sup>111</sup>

<sup>108</sup>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李学勤主编：〈隐公十一年〉卷四，《春秋左传正义》上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130。

<sup>109</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满庭芳〉（归去来兮），《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506。

<sup>110</sup> 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七年甲子，四月一日将自黄移汝，留别雪堂邻里作《满庭芳》。”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满庭芳〉（归去来兮），《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507。

<sup>111</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定风波〉（谁羡人间琢玉郎），《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579。

当代学者李泽厚有云：“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空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他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和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sup>112</sup>此词作于元祐元年（1086），一句“此心安处是吾乡”，将入世与出世的思想有机的结合了起来，退隐无需归乡，凡心安处便是故乡，然归与不归，仕与不仕，已不再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了。这种只在自我意识上进行的“心隐”与陶渊明的“身隐”，虽于形式上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皆达至思想的升华与人格的完善。

### 三、晚年流放天涯归属自我——“此心安处是吾乡”

苏轼自幼“奋厉有当世治”，抱着“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心态踏入仕途，其时功名心重。然而，“乌台诗案”却为苏轼这一抱负烙下了沉重的印记，并开始反思自己不断努力付出至终却一无所得，甚是丧失人格与尊严，自入世以来所依附的这条仕途道路该如何走下去？在坚持与信念动摇之际，在佛、禅思想中觅得一处

---

<sup>112</sup> 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台北：三民书局，1996，页159。

栖身之所，从而反思过往的行为，并开展另一种人生价值观。但这一新的人生价值观并未使苏轼免于政治的侵害，在绍圣元年（1094）被视为“元祐党人”<sup>113</sup>而连续遭受“三改谪命”<sup>114</sup>的迫害。然而，他在黄州时期形成的人生态度，并未随政治地位的动荡而改变，无论是在“瘴疠之地、蛮貊之邦”<sup>115</sup>的惠州或是“人迹罕至”的儋州，仍继续深刻思考人生这一命题，并更进一步的加深对生命与宇宙间的探索，以至最终形成了超然物外、不为外世所累的人生哲学。

于元祐元年（1086）时司马光主持政事，尽废“新法”，史称“元祐更化”，此时苏轼重新被受重用，次年兼侍读，继年权知礼部贡举，于一、二年之间，平步青云，从仕至官。虽此为苏轼任宦得意之期，却无因此自满，对“元祐更化”他主张“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sup>116</sup>，然却引起激烈的争辩，甚招来其他大臣的猜忌，再一次不安于朝而自请外任。自离开黄州期间，苏轼于词中不经反复吟咏“人生”之音：

---

<sup>113</sup> 神宗元丰三年（1080）御史台兴“乌台诗案”，时值四十五的苏轼被以“谤讪朝廷”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元祐初，哲宗年幼，高太后主政，起用于反对熙宁变法的旧官，苏轼受到太后特别的器重，累官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尚书。但苏轼又不赞成司马光尽废新法，因政见不合，第二次主动请求外任，出知杭州、颍州等地。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改元绍圣，罢“元祐党人”，苏轼于绍圣初年（1094）以“讥斥先朝”罪贬知英州，尚未到达贬所，六月又贬惠州，绍圣四年（1097）再贬儋州。

<sup>114</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赴英州起舟行状〉卷三十七，《苏轼文集》第三册，页1043。

<sup>115</sup>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绅。集注：蛮，南蛮。貊，北狄。见程树德著，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卫灵公上〉卷三十一，《论语集释》第四册，页1065。

<sup>116</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辩试馆职策问劄子〉卷二十七，《苏轼文集》第二册，页792。

睡起画堂，银蒜押帘，珠幕云垂地。初雨歇，洗出碧罗天，正溶溶养花天气。  
一霎时，风迴芳草，荣光浮动，掩皱银塘水。方杏靛匀酥，花须吐绣，园林排比红  
翠。见乳燕捎蝶过繁枝。忽一线钿香逐游丝。昼永人闲，独立斜阳，晚来情味。  
便乘兴携将佳丽。深入芳菲里。拨胡琴语，轻拢慢捻总伶俐。看紧约罗裙，急趣檀  
板，霓裳入破惊鸿起。颦月临眉，醉霞横脸，歌声悠扬天际。任满头红雨落花飞。渐  
鸂鶒楼西玉蟾低。尚徘徊、未尽欢意。君看今古悠悠，浮宦人间世。这些百岁，光阴  
几日，三万六千而已。醉乡路稳不妨行，但人生、要适情耳。<sup>117</sup>

莫叹平齐落落，且应去鲁迟迟。与君各记少年时，须信人生如寄。 白发千  
茎相送，深杯百罚休辞。拍浮何用酒为池。我已为君德醉。<sup>118</sup>

古岸开青葙，新渠走碧流。会看光满万家楼。记取他年扶路、入西州。 佳  
节连梅雨，余生寄叶舟。只将菱角与鸡头。更有月明千顷、一时留。<sup>119</sup>

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与君各赋一篇诗，留织女、鸳鸯机上。  
还将旧曲，重赓新韵，须信吾侪天放。人生何处不儿嬉，看乞巧、朱楼綵舫。<sup>120</sup>

苒苒中秋过，萧萧两鬓华。寓身此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 方  
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早知身世两赘牙。好伴骑鲸公子、赋雄夸。<sup>121</sup>

<sup>11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哨徧·春词〉（睡起画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590-591。

<sup>118</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西江月·送钱待制穆父〉（莫叹平原落落），《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597。

<sup>119</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南歌子·湖景〉（古岸开青葙），《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616。

<sup>120</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乘槎归去），《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618。

<sup>121</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南歌子·再用前韵〉（苒苒中秋过），《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624。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sup>122</sup>

上述所列之词，据《苏轼词编年校注》乃作于元祐三年至元祐六年年间（1088-1091），此时的苏轼看待人生更为虚幻、飘渺。他不仅认为人活于世要“适情”，甚有“何处不儿嬉”的放纵思想，更自觉人生如“寄”，寄于“叶舟”、“一尘沙”，前者能有两意：一为无绳系之扁舟，漫无目的漂游汪洋；二为，欲寄扁舟归乡，而后者可意为人之渺小，微不足道，一吹即散。倘若“人生如寄”那对苏轼来说在这趟“逆行之旅”中所扮演的角色只是个匆匆的过客。然为何苏轼会发出如此的人生感慨？而与此同时，他又怎么化解“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宇宙空间”之间的矛盾？而这种种的答案有赖于党争对苏轼的抨击。

于绍圣元年(1094)，新党政权变质，从改革意见分歧之争，演变为党派的倾轧，大贬元祐旧臣，苏轼首当其冲，再遭诬陷，《长编拾补·卷九》：

侍御史虞策言：“吕惠卿等指陈苏轼所作诰词，语涉讥讪，望劾实施行。”殿

中侍御史来之邵言：“轼在先朝，久以罢废，至元丰擢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轼

---

<sup>122</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临江仙·送钱穆父〉（一别都门三改火），《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665。

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忿怨之私。”……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sup>123</sup>

虞策等人以为“罪罚未当”，四月十三日，复降充左承议郎，仍知英州<sup>124</sup>，途中未至，又三易诰命，诏谪惠州。此时年已五十九，且惠州地处岭南，乃瘴疠、蛮貊之地，垂老投荒，居徙不定，生活困蹇，更甚黄州之时，且白发萧散远谪岭外，孤寂、落寞之悲歌再为苏轼谱上新曲，其诗有〈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

春风岭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断魂。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蜒雨愁黄昏。长条半落荔支浦，卧树独秀枕榔园。岂惟幽光留夜色，直恐冷艳排冬温。松风亭下荆棘里，两株玉蕊明朝暾。海南仙云娇堕砌，月下缟衣来扣门。酒醒梦觉起绕树，妙意有在终无言。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sup>125</sup>

相较之“乌台诗案”贬至黄州初期那“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的“无助”，此时再一次面对政治风暴的淋洗，于心境上表现出的却是一种“先生独饮勿叹息，幸有落月窥清樽”的“无奈”之慨。而其词有〈西江月·中秋和子由〉：

---

<sup>123</sup> 本日纪事：“侍御史虞策言：‘苏轼既坐讥斥之罪，犹得知州，罪罚未当。诏轼降充左承议郎。’”见【宋】李焘著，【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哲宗绍圣元年〉卷九，《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页401。

<sup>124</sup> 见【宋】李焘著，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哲宗绍圣元年〉卷九，《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第一册，页403。

<sup>125</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卷三十八，《苏轼诗集》第六册，页2075。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  
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sup>126</sup>

又如〈千秋岁·次韵少游〉：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  
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  
觐。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恣浮于海。<sup>127</sup>（能改斋漫录卷十七）

此刻已将“一尘沙”化作“一场大梦”，而“叶舟”化为“桴”，于意境上更为抽象、浮漂。但此次面对政党的诬陷，无同于黄州初期的消极、低靡，苏轼仍把持自我，于贬居惠州时期，还提出了自己的荣辱观：

此生太山重，忽作鸿毛遗。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贤哉晏平仲，事君不以  
私。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  
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颗真孝爱，三良安足希。仕宦岂不荣，有时  
缠忧悲。所以靖节翁，服此黔娄衣。<sup>128</sup>

<sup>126</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西江月·中秋和子由〉（世事一场大梦），《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798。

<sup>12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千秋岁·次韵少游〉（岛边天外），《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803。

<sup>128</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和陶咏三良〉卷四十，《苏轼诗集》第七册，页2184。

深刻批判那些盲目为君王鞠躬尽瘁的行径，强调“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若君为一己之私，而臣万不得赴死，否则将失其大节，即是将重如泰山的此生，绝不能作鸿毛般牺牲。而对于君王之治命，为臣者必得从之，然君王之乱命，为臣者有所可违，甚是贵为君王亦不得视千万臣民为犬马之徒，这为下层人士发出深深的不平之声。<sup>129</sup>他否定了表面上荣耀显贵实则可悲的仕宦之路，秉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sup>130</sup>的节操。朱弁《曲洎旧闻》有这么一段记载：

东坡性不忍事，尝云：“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晁美叔每见，以此为言。坡云：“某被昭陵擢在贤科，一时魁旧，往往为知己。上赐对便殿，有所开陈，悉蒙嘉纳。已而章疏屡上，虽甚剴切，亦终不怒。使某不言，谁当言者。子之所虑，不过恐朝廷杀我耳。”美叔默然，坡浩叹久之，曰：“朝廷若果见杀我，微命亦何足惜，只是有一事，杀了我后好了你。”遂相与大笑而起。（美叔，名端彦）<sup>131</sup>

虽“否定故我”但仍不改那效仿范滂直言衷谏的初衷。

于此，他还提出新的独特生活态度——“思我无所思”，前个“思”指人对功利的追逐，后个“思”指对垢污尘世醒悟后所获得的人生价值观，即是指人不必

---

<sup>129</sup> 王启鹏、陈思君著：〈对士大夫传统人格的超越——论苏轼寓惠思想〉，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页 107。

<sup>130</sup> 【清】焦循著，沈文倬点校：〈滕文公下〉卷十二，《孟子正义》上册，页 419。

<sup>131</sup> 【宋】朱弁著，孔凡礼点校：《曲洎旧闻·东坡与晁美叔言性不忍事》卷五，《唐宋史料笔记丛刊》，页 158。

执着于现实世界的穷通贵贱、生死得失、抛却功利的价值观。<sup>132</sup>若“思我无所思”是生活态度，那“吾生本无待”便是生活中所遵循的法则，“无待”是为苏轼饱经宦海浮沉数载，对功名利禄了无驻心，并对生活进行深刻反思后所树立的人格理想。在经深刻反思对人生价值观有新的看法，致使苏轼于“瘴疠之地”的惠州在生活上却是美好适志，正因为舍弃了尘世中浮华的羁绊，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以其超然物外的思想，面对现实生活以真实的情感体验，故能在这实为悲怆的岁月中，籍此精神以豁达开朗的心境对待生活。王水照先生说得精辟：“从生活实践而不是从纯粹思辨去探索人生底蕴，这是苏轼思维的特点。”<sup>133</sup>

于贬儋的三年岁月，穷居海外、与亲人挚友遥寄思念，在他作品中多有流露自己晚年对人生这一命题的领悟，对自己历经“一生凡九迁”<sup>134</sup>的心路生涯，将之升华为一种心理经验，一种实现自我的“内在超越”，这种精神境界的哲理依归，即是寄“有限的生命”于“无穷的宇宙”之中。<sup>135</sup>〈汲江煎茶〉一诗云：

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茶雨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泻时声。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城长短更。<sup>136</sup>

<sup>132</sup> 王启鹏、陈思君著：〈对士大夫传统人格的超越——论苏轼寓惠思想〉，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页 110。

<sup>133</sup>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 544。

<sup>134</sup> 【元】脱脱著：〈仁宗赵禎本纪第九〉卷九，《宋史》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页 527。

<sup>135</sup> 唐玲玲著：〈寄我无穷境——苏轼贬儋期间的生命体验〉，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页 89。

<sup>136</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汲江煎茶〉卷四十三，《苏轼诗集》第七册，页 2362。

运用“大瓢”与“小杓”勾勒出自己对人生的顿悟。与宇宙空间、宽江大河相较于人的微乎其微，在这悬殊对比下，人该如何面对这在现实人生间的浩大世事，便取决于“选择”。然“大”并非不可掌控，而“小”也并非无济于事，这就是人生在世所避不可避的中心问题。苏轼于海南岛对于这一问题的深刻思考，决定他在人生濒临绝境时能采取超然的积极人生态度处之。于〈独觉〉一诗曰：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悠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sup>137</sup>

时隔二十年对人生哲理的思考，相较黄州所作《定风波》一词所蕴含的精神寄托于内涵上更具深化。结合他大半生的际遇与当下的境况，显示出的是一个即脆弱又坚强的心灵状貌，昭示着重视生活亦不屈服的苏轼。

于晚年的苏轼对庄子之学颇有阐发，《庄子·齐物论》曰：

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始终，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sup>138</sup>

<sup>137</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独觉〉卷四十一，《苏轼诗集》第七册，页2284。

<sup>138</sup>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内篇·大宗师〉卷三上，《庄子集释》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页268。

苏轼对此有所吸取更将贬谪视之为“游”：

《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彷彿曾游岂梦中。”<sup>139</sup>

暮年遇赦北归，《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兹游奇绝冠平生。”<sup>140</sup>

苏轼本着“无待”目空一切功利目的，发之本心不依附外在因素，使其生命个体独立自主，树立起“任性逍遥”的潇洒人格。《庄子·秋水》曰：

北海若曰：“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sup>141</sup>

苏轼对此有所启示：

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眇观大瀛海，坐咏谈天翁。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

---

<sup>139</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十月二日初到惠州》卷三十八，《苏轼诗集》第六册，页2071。

<sup>140</sup>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见【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卷四十三，《苏轼诗集》第七册，页2366。

<sup>141</sup>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秋水》卷六下，《庄子集释》下册，页564。

终。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急雨岂无意，催诗走群龙。梦云忽变色，笑电亦改容。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sup>142</sup>

对于宇宙无穷而生命有尽的人生体悟：人生对于天地之大，实微不足道，而在茫茫的宇宙太仓中，人们生活里常为蝇头小利、粒米而决雌雄，此当为不可避之。但海南奇伟的山光水色、清风急雨激发他对贬谪生涯的哲理思考，所表现的态度更为清闲淡雅。

苏轼于晚年历经人生千态，一场场胜败荣辱后的感悟，在其心灵深处交融着诸家的精神思想，既有儒家的因素，亦具道家的色彩，也有佛禅的氛围。其一生所历经的磨难与挫折，非但没有毁灭其对人生的意念，还成为他在精神思想上得到进一步升华的有利因素。他之所以能于不幸的际遇中，在人生处世态度上，始终不改其乐，除与之乐观豁达的性格有关外，也与其思想至关密切。在北宋活跃的文化氛围中，集儒、道、佛于一身的思想促使他在面对接踵而至的困境中，得以处之泰然，不为人生苦短、人生坎坷而折腰。他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然态度；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加以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至蔑视丑恶、消解苦痛。本着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儒家的入世和有为，引导他热爱生活与生命；道家的“无为”尤其是庄子“齐物论”，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从容自处；佛家的静达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和

---

<sup>142</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行琼、儋间，肩车坐睡。梦中的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甘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卷四十一，《苏轼诗集》第七册，页 2246-2248。

通达。而苏轼晚年在海南岛的思索，既强调有限人生的生活价值，又向着无限的宇宙境界去作精神追求，在物质与精神、现实与理想中取得平衡。这种执着人生、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使他能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人生无常”的变化。

### 第三章：“天涯何处无芳草”豁达自适的人生观

苏轼一生所处的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宋神宗（1068—1085），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排斥出朝廷，而苏轼也牵连在内。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高太后垂帘听政，启用旧党人士方面而立斥新党，被认为属于旧党的苏轼而能回朝。而高太后逝世后，在宋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1094—1100）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士人，苏轼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流放，无可幸免。宋徽宗即位之初（1100），欲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兼用新旧，故以“建中靖国”为年号。苏轼处在这来往朝野，反复重用与贬斥的环境中，居无定所，犹如漂泊海角、浪迹天涯，而此部分将从《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分类分析“天涯”之词，并且从“天涯”二字于词中所表露的思想情感以归结出“天涯”对苏轼的悸动，由此了解苏轼的人生观。

#### 第一节：苏轼词中“天涯”出现的次数

王水照先生将苏轼的一生归结为经历了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过程。在此简述苏轼人生经历第一次的过程：

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到凤翔府签判任<sup>143</sup>，开始他的仕宦生涯。

熙宁四年（1071）六月，外任杭州通判，十一月到达任上，相继任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此外任地方官长达八年之久。

元丰三年（1080）正月出京，二月一日抵黄州，居黄四年。元丰七年（1084）四月离黄北上。

第二次的过程：

元祐元年（1086）三月，成为中书舍人，九月升为翰林学士。

元祐四年（1089）七月，外任杭州知州，到绍圣元年（1094）四月，这五年中，除两度返朝任京官，他历任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

绍圣元年（1094）十月，到达贬所惠州；绍圣四年（1097），七月，到达贬所儋州，元符三年（1100），六月，离开贬居三年的海南岛。

据上述简述所示，苏轼在朝任官的时间（10年+4年）共有十四年，占其仕宦之路的37.84%；而外任的时间（8年+5年）共有十三年，占其仕宦之路的35.13%；而在贬所任官的时间（4年+6年）共有十年，占其仕宦之路的27.03%。故见得苏轼在京师

---

<sup>143</sup> 见孔凡礼著：〈嘉祐六年〉卷四，《苏轼年谱》上册，页97。

的时间仅有三分之一，而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地方上任官。依据《苏轼词编年校注》对苏轼词的编年校勘能整理出如下表<sup>144</sup>：

计量	年	月	地点	词牌
1	治平元年 (1064)	-	十二月罢凤翔府 签判，返京，过 长安，游骊山作	〈华清引〉
2	熙宁二年 (1069)	春	洛阳	〈一斛珠〉
4	熙宁四年 (1071)	十月	楚州	〈南歌子〉、〈又〉
4首	年	月	地点	词牌
3	元祐元年 (1086)	二月至九月	东京	〈定风波〉、〈如梦令〉二首
4	元祐二年 (1087)	-		〈苏幕遮〉
6	元祐三年 (1088)	春至九月		〈哨徧〉、〈西江月〉
6首				

\*上表显示，两次在朝各别作词有4首与6首，共计10首。

计量	年	月	地点	词牌
2	熙宁五年 (1072)	正月至秋	杭州	〈浪淘沙〉、〈浣溪沙〉
4		十二月	湖州	〈双荷叶〉、〈荷花媚〉

<sup>144</sup> 此表乃穿插苏轼两次在朝——外任——贬居的时段，依序排列，而并非将两次过程个别分开整理。据鄒同庆、王宗堂所著的《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编年词”292首；“未编年词”39首及残句11则；“他集互见词”8首；“苏轼存疑词”11首；“误入苏集词”53首及残句9则。

6	熙宁六年 (1073)	春	巡行富阳、新城、桐庐、过七里濑作	〈行香子〉、〈祝英台近〉
7		-	寒食游杭州西湖作	〈瑞鹧鸪〉
10		六至八月间	杭州	〈江城子〉、〈菩萨蛮〉、 〈瑞鹧鸪〉
11		八月	游风水洞作	〈临江仙〉
12		九月	杭州	〈江城子〉
13	熙宁七年 (1074)	正月	自杭州赴润州，过丹阳作	〈行香子〉
14			丹阳	〈减字木兰花〉
15		二月	于金山送刘瑾赴灵仙作	〈昭君怨〉
16		三月	自京口还作	〈卜算子〉
17		春	京口	〈蝶恋花〉
18		春以前	杭州通判	〈占春芳〉
19		四月	离京口作	〈醉落魄〉
20			润州	〈少年游〉
35		夏至九月	杭州	〈减字木兰花〉、 〈鹊桥仙〉、〈虞美人〉、 〈诉衷情〉、〈菩萨蛮〉、 〈减字木兰花〉、 〈菩萨蛮〉、★〈江城子〉、 〈菩萨蛮〉、〈清平乐〉、 〈南乡子〉、〈劝金船〉、

				★〈南乡子〉、〈浣溪沙〉、 〈又〉
40		九月	湖州	〈南乡子〉、〈又〉、 〈定风波〉、 〈减字木兰花〉、〈南乡子〉
41			游松江作	〈菩萨蛮〉
43		十月	苏州	〈阮郎归〉、〈醉落魄〉
48			润州	★〈菩萨蛮〉、〈采桑子〉、 〈减字木兰花〉、 ★〈醉落魄〉、〈诉衷情〉
49			楚州	〈更漏子〉
51			海州	〈浣溪沙〉、〈永遇乐〉
52			由海州赴密州途中作	〈沁园春〉
53		冬	密州	〈南乡子〉
59	熙宁八年 (1075)	正月至冬		〈蝶恋花〉、〈江城子〉、 〈雨中花慢〉、〈江城子〉、 〈减字木兰花〉、〈又〉
72	熙宁九年 (1076)	早春至十二月		〈一丛花〉、〈蝶恋花〉、 〈满江红〉、〈殢人娇〉、 〈望江南〉、〈又〉、 〈满江红〉、〈临江仙〉、 〈水调歌头〉、〈何满子〉、 〈画堂春〉、〈江城子〉、

				〈又〉
74	熙宁十年 (1077)	正月	济南	〈阳关曲〉、〈浣溪沙〉
75		二月	郓州	〈浣溪沙〉
77		三月	汴京郊外作	〈殢人娇〉、〈洞仙歌〉
78		春	东京	〈满庭芳〉
82		七月至八月	徐州	〈浣溪沙〉、〈阳关曲〉、 〈水调歌头〉、〈浣溪沙〉
83		-		〈菩萨蛮〉
84		-	自密移徐州途中作	〈临江仙〉
98	元丰元年 (1078)	正月至十月	徐州	〈临江仙〉、〈蝶恋花〉、 〈浣溪沙〉、 〈浣溪沙〉五首、 〈蝶恋花〉、〈南乡子〉、 〈千秋岁〉、★〈永遇乐〉、 〈阳关曲〉、〈浣溪沙〉
102	元丰二年 (1079)	三月		〈南乡子〉、〈又〉、 ★〈江城子〉、 〈减字木兰花〉
103		四月	扬州	〈江城子〉
105		五月至七月	湖州	〈南歌子〉、〈渔家傲〉
<b>105 首</b>	<b>年</b>	<b>月</b>	<b>地点</b>	<b>词牌</b>
5	元祐四年 (1089)	秋至九月	杭州	〈行香子〉、〈渔家傲〉、 〈浣溪沙〉二首、〈点绛唇〉

17	元祐五年 (1090)	二月至九月		〈临江仙〉、〈南歌子〉、 〈又〉、〈鹊桥仙〉、 ★〈南歌子〉二首、 〈点绛唇〉、〈又〉、〈又〉、 〈好事近〉、〈浣溪沙〉、 〈南歌子〉
31	元祐六年 (1091)	正月至三月		〈浣溪沙〉、〈又〉、 〈又〉、〈木兰花令〉、 〈减字木兰花〉、 〈西江月〉三首、 〈木兰花令〉、〈虞美人〉、 ★〈临江仙〉、 〈八声甘州〉、 〈减字木兰花〉、〈西江月〉
32		三月	湖州	〈定风波〉
34		四月	润州	〈临江仙〉、〈蝶恋花〉
35			扬州	〈临江仙〉
36		八月	东京	〈南歌子〉
37			于东京赴颍州途中	〈满江红〉
38			颍州	〈木兰花令〉
39		九月		〈减字木兰花〉
40	元祐七年 (1092)	正月		〈减字木兰花〉
41		三月	泗州	〈木兰花令〉

45		四月至八月	扬州	〈浣溪沙〉、 〈减字木兰花〉、 〈生查子〉、〈青玉案〉
47	元祐八年 (1093)	-	定州	〈行香子〉、〈又〉
48	绍圣元年 (1094)	正月		〈戚氏〉
49		七月	九江	〈归朝欢〉
50		八月	造口	〈木兰花令〉
52		九月	广州	〈浣溪沙〉、〈又〉
<b>52 首</b>				

\*上表显示，两次外任各别作词有105首与52首，共计157首。

★此记号表为该词中出现“天涯”二字，或出现与其相近之意，记共有八个。

计量	年	月	地点	词牌
1	元丰三年 (1080)	一月	赴黄州，途经麻城岐亭，赠陈造作	〈临江仙〉
12		二月至冬	黄州	〈卜算子〉、〈南歌子〉、 〈南乡子〉、 〈菩萨蛮〉二首、〈定风波〉、 〈水龙吟〉、〈菩萨蛮〉四首
24	元丰四年 (1081)	正月至十二月		〈少年游〉、〈水龙吟〉、 〈水调歌头〉、〈少年游〉、 〈南乡子〉、〈满江红〉、

				〈浣溪沙〉五首、〈江城子〉
62	元丰五年 (1082)	正月至十二月		〈水龙吟〉、〈江城子〉、 〈定风波〉、〈浣溪沙〉、 〈西江月〉、〈南歌子〉、 〈又〉、〈又〉、〈浣溪沙〉、 〈渔夫〉四首、〈调笑令〉、 〈又〉、〈满江红〉、 〈南歌子〉、〈哨徧〉、 〈渔家傲〉、〈定风波〉、 〈念奴娇〉、〈渔家傲〉、 〈洞仙歌〉、〈水龙吟〉、 〈念奴娇〉、〈醉蓬莱〉、 〈西江月〉、〈定风波〉、 〈减字木兰花〉、〈又〉、 〈又〉、〈又〉、〈又〉、 〈西江月〉、〈菩萨蛮〉、 〈醉翁操〉、〈满庭芳〉、 〈定风波〉
75	元丰六年 (1083)	三月至十二月		〈木兰花令〉、〈临江仙〉、 〈好事近〉、〈满庭芳〉、 〈鹧鸪天〉、〈十拍子〉、 〈浣溪沙〉、〈又〉、 〈水调歌头〉、〈南歌子〉、 〈临江仙〉、〈减字木兰花〉、

				〈皂罗特髻〉
78	元丰七年 (1084)	正月至四月		〈减字木兰花〉、 〈无愁可解〉、〈满庭芳〉
79	元丰七年 (1084)	四月	兴国	〈阮郎归〉
80		七月	去黄北归，过姑熟，见徐君猷侍儿胜之作	〈西江月〉
81			与王益柔游金陵赏心亭作	〈渔家傲〉
82		八月	金陵	〈水龙吟〉
84			润州	〈减字木兰花〉、〈南歌子〉
85		九月	宜兴	〈菩萨蛮〉
86			真州	〈南歌子〉
87		十月	扬州	〈西江月〉
89		十一月	楚州	〈浣溪沙〉、〈又〉
90			与秦观淮上饮别作	〈虞美人〉
97		十二月	泗州	〈如梦令〉、〈又〉二首、 〈浣溪沙〉、〈行香子〉、 〈水龙吟〉、〈满庭芳〉
98	元丰八年 (1085)	正月	宿州	〈南乡子〉
99		二月	南都	〈满庭芳〉
100		六月	宜兴	〈蝶恋花〉
101		九月	楚州	〈蝶恋花〉

102		十月	涟水	〈蝶恋花〉
<b>102 首</b>	<b>年</b>	<b>月</b>	<b>地点</b>	<b>词牌</b>
2	绍圣元年 (1094)	十月至岁末	惠州	〈浣溪沙〉、〈西江月〉
9	绍圣二年 (1095)	春至初夏		〈临江仙〉、★〈蝶恋花〉、 〈减字木兰花〉、〈殢人娇〉、 〈浣溪沙〉、〈又〉、〈贺新郎〉
13	绍圣三年 (1096)	正月至十月		〈蝶恋花〉、〈三部乐〉、 〈雨中花慢〉、〈西江月〉
17	绍圣四年 (1097)	二月		〈虞美人〉、〈减字木兰花〉、 〈浣溪沙〉、〈又〉
18		八月	儋州	〈西江月〉
21	元符二年 (1099)	立春至四月		★〈减字木兰花〉、 ★〈千秋岁〉、★〈踏青游〉
22	元符三年 (1100)	四月		〈减字木兰花〉
23		十二月	韶州	〈鹧鸪天〉
<b>23 首</b>				

\*上表显示，两次贬谪各别作词有102首与23首，共计125首。★记共有四个。

上述统计仅于大体上的整合，如熙宁四年（1071）苏轼任杭州通判期间到过润州于其上作有七首词皆列入作于任杭州通判期间。苏轼一生，十四年在朝任官的时间所作之词共计10首，于中没有出现“天涯”或与之近意之词；十三年在外任官所作之词共有157首，于中八首出现“天涯”或与之近意之词；十年的贬居生涯期间作词

有125首，于中四首出现“天涯”或与之近意之词，如是可观，苏轼于地方上所作词之数量相较于之于在朝任官。

据《苏轼年谱》载：“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十四日，到凤翔府签判任。”<sup>145</sup>由此可知，苏轼在初入仕宦的十年间，似乎无意于写词，《苏轼词编年校注》所编入就仅〈华清引·感旧〉（平时十月幸莲汤）、〈一斛珠〉（洛城春晚）、〈南歌子·楚守周豫出舞鬟〉（绀绀双蟠髻）及〈同前〉（琥珀装腰佩）此四首。再观苏轼熙宁四年（1071）抵杭州任通判期间所写《南歌子》、《行香子》及《临江仙》等一些游赏山水的短调小令；熙宁七年（1074）知密州作有长调《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熙宁八年（1075）在密州有作悼亡词《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游猎词《江城子·猎词》（老夫聊发少年狂），熙宁九年（1076）有作抒怀词《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明月几时有）、元丰元年（1078）在徐州有作农事词《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等，从这各类题材所描写的词中能清楚的认识到了苏轼那“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文采风范与他那“以诗为词”的写作意念。

经由对苏轼创作数量所作的一番整理而得出，苏轼于地方上的词作产量远多于在朝期间，此外，就《苏轼词编年校注》所编，得知苏轼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出官杭州后方始驻心于词的创作，其时已年三十七，然在此前近十年的岁

---

<sup>145</sup> 见孔凡礼著：〈嘉祐六年〉卷四，《苏轼年谱》上册，页97。

月中却无词作记录，在此或能有一些因素说明之。对于满怀“以天下为己任”的炽热之心踏入官场的苏轼其时不仅因初应贡举高中，亦深得欧阳修、梅尧臣等名仕的知赏，故其立当致力于关系国家治乱安危的大计，如《思治论》、《应诏集》、《策论》等论著。于此情形之际定当无暇着意于小词的写作，直到朝中的政治斗争与官场倾轧致使被弹劾的苏轼心感不安而自请外任为杭州通判之后才开始著词。<sup>146</sup>由此可知，苏轼驻心于词乃时值“以天下为己任”的志意受打击挫败，除此，苏轼有词〈虞美人〉道：

湖山信是东南美。一望须千里。使君能得几回来？便使尊前醉倒、且徘徊。

沙河塘里灯初上。水调谁家唱？夜阑风静欲归时，惟有一江明月、碧琉璃。<sup>147</sup>

词中抒写因杭州湖山之美，而令人醉心于此，并难以离去。杭州那富有美丽韵致的山水风景也正是引发苏轼致词之意兴的另一因素。

## 第二节：“天涯”对苏轼的悸动

依据上表所示，“天涯”二字或与之近意，仅出现在苏轼外任期间所作之词与贬谪惠州、儋州之时。此节将一一列举苏轼词中出现“天涯”二字以及出现或与

<sup>146</sup> 叶嘉莹著：〈论苏轼词〉，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三辑，页 183-184。

<sup>14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虞美人·为杭守陈述古作〉（湖山信是东南美），《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67。

“天涯”之意相近之词，并加以分析，希图从中得以理解“天涯”对苏轼不论是在精神或心境上的影响，由此归结出“天涯”对苏轼的人生意义。

## 一、“云海天涯两杳茫”的漂泊感

第一首，〈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翠蛾羞黛怯人看。掩霜纨。泪偷弹。且尽一尊、收泪唱阳关。漫道帝城天样远。  
天易见，见君难。画堂新缔近孤山。曲阑干。为谁安。飞絮落花、春色属明  
年。欲棹小舟寻旧事，无处问，水连天。<sup>148</sup>

王文诰《苏诗总案》卷十二：“（于）熙宁七年（1074）甲寅，七月，与陈襄泛舟湖上，燕于孤山竹阁，作《江神子》词。”<sup>149</sup>苏轼在杭州通判时期，为送别友人陈襄而作，两人不仅政治理念相近亦是诗酒朋友，守杭期间甚为投机。据《乾道临安志》卷二曰：“白公竹阁在孤山，与柏堂相连，有唐刺史白居易祠堂。”<sup>150</sup>竹阁在杭州西湖孤山寺内，为白居易在杭州时所建，故又称“白宫竹阁”。

---

<sup>148</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翠蛾羞黛怯人看），《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78-79。

<sup>149</sup> 见于注一，王宗堂著：〈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翠蛾羞黛怯人看），《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79。

<sup>150</sup> 《乾道临安志》卷二。见于注一，鄒同庆、王宗堂著：〈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翠蛾羞黛怯人看），《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79。

这首词是作者摹拟官妓语气、行为，代她向陈襄表示惜别之意，词中上阙描述的是此名官妓在饯别时的情景。首先表现出她在送别长官时的悲伤情态：“翠蛾”即言美人之眉；“羞黛”乃是指眉目含羞之态；“霜纨”是用白色薄绢制作之扇。因离别感伤泪下却又似觉羞愧而“怯人看”以取笑之，故用扇子遮掩偷偷弹泪，在陈襄离别之际虽不舍仍强抑泪水更劝一杯酒，并唱起《阳关曲》。然《阳关曲》即唐代诗人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谱入乐府后所称，亦名《渭城曲》，用于送别场合。<sup>151</sup>而“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句乃官妓劝酒时的赠别之言，由此委婉的表述自己的留恋之情，虽帝城（京城）如天般远，但欲见陈襄这一位太守相较于见到京城还来得不易，由此表达出一别还能再续的茫然与奢望。词情的发展之词达至高潮，而下阙全是推写官妓对太守的相思之情，官妓想想，倘若太守尚留住或还能同她于画堂之曲栏见共游观眺，由此不免勾起往事回忆，叹息“春色属明年”大概此情此景明年不复在，若果泛舟西湖寻觅旧迹欢事已“无处问”。由此可见，作者善于描摹歌妓情态方才挥写得如此丝丝入扣，达至艳而不俗，哀而不伤的艺术效果。此外，苏轼也有作〈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其题名为“赠润守许仲涂，且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为句首”<sup>152</sup>由此可观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的另一侧面，官妓歌舞助宴，虽罗衣艳装，却自由受限，处于卑微地位，词中官妓敬劝别酒、缅怀旧事、瞻念未来之时充斥着凄凉的氛围。

<sup>151</sup> 见于注四，鄒同庆、王宗堂著：〈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翠蛾羞黛怯人看），《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80。

<sup>152</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减字木兰花〉（郑庄好客），《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521-522。

然而，将词中视角从官妓之所思所想转换为词人的现思现想中来解读，所得出的思想情感何尝不近与官妓之所思呢？对于词的中心语“漫道帝城天样远。天易见，见君难”句，在《世说新语》中卷下《夙愿》有段记载：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sup>153</sup>

此即“天易见，见君难”所本。苏轼之所以自请外任乃不容于朝，此番心境雷同与官妓，此时欲见京城乃易但见君王却难。在宋代官制重内轻外，京官中与宰执政见不同者，若不议罪贬窜，则以出任相应级别的地方官为最常见的“下野”方式，一位官员连续在地方上任职而不被调往京城，说明其仕途不遂，倘是个不同政见者，很可能不准进入京城，称作“有旨不许入国门”。在熙宁十年（1077）苏轼于密州任满赴京述职时，便遭受到“有旨不许入国门”的待遇。<sup>154</sup>于此联想，苏轼作此词或有此忧虑，迫于无奈自请外任，然而心仍牵挂朝中政事的情况，却不得其门而入，只能远眺不能近身，此中别有一番苦闷。

<sup>153</sup> 【南朝宋】刘义庆著，圩震鄂编：〈夙愿第十二〉中卷下，《世说新语》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323。

<sup>154</sup>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79。

第二首、第三首、第四首：

东武望余杭。云海天涯两杳茫。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  
不用诉离觞。痛饮从来别有肠。今夜送归灯火冷，河塘。堕泪羊公却姓杨。<sup>155</sup>

——〈南乡子·和杨元素〉

玉笙不受朱唇暖。离声凄咽胸填满。遗恨几千秋。恩留人不留。 他年京国  
酒。泣泪攀枯柳。莫唱短因缘。长安远似天。<sup>156</sup>

——〈菩萨蛮·润州和元素〉

分携如昨。人生到处萍飘泊。偶然相聚还离索。多病多愁，须信从来错。  
尊前一笑休辞却。天涯同是伤沦落。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sup>157</sup>

——〈醉落魄·席上呈元素〉

以下将以各别词牌简称之，以上三首的写作时间皆作于熙宁七年（1074）：

九月，作于杭州。《纪年录》载：“……移守密州，和元素《南乡子》。”

十月，作于润州。《纪年录》载：“……润州和元素（作）《菩萨蛮》。”

十月，作于润州。《纪年录》载：“……离京口呈元素作《醉落魄》。”<sup>158</sup>

<sup>155</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南乡子·和杨元素〉（东武望余杭），《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90。

<sup>156</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菩萨蛮·润州和元素〉（玉笙不受朱唇暖），《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116。

<sup>15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醉落魄·席上呈元素〉（分携如昨），《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123。

<sup>158</sup> 傅藻著：《东坡纪年录》。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90、117、124。

由于三首的写作时间相近，加之所要表述对象亦是同一人，故在此用先后分析的方式互相观照：第二首，〈南乡子〉中赞扬友人深得民心之功业，同时，借他人功成名就对比自己现时功名无成，从而发出“何日功成名遂了”的叹息。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带有一种茫茫然、不可预知的情感，不知“何日功成名遂”，亦不知何日得以“还乡”，更不知何日能过上“醉笑陪公三万场”般自得、写意的生活。

第三首，〈菩萨蛮〉上阙抒写与友人离别所表现出那“不暖”、“离声”、“凄咽”、“遗恨”、“人不留”的悲伤之情，此番种种忧伤的导因皆是来自君命难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于此同时借以抒发个人仕途不顺遂的感慨与叹息，下阙所用“泪”、“枯”、“短”、“远”冷色词汇，更添惆怅之感。此词中的“长安远似天”所表现的心境近似第一首〈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亦充满满腔的愁楚与苦闷。

对于第四首〈醉落魄〉的写作背景，《苏轼诗集》卷二十一〈次韵答元素〉施注云：“东坡在杭三年，将去而元素来守杭。”盖苏轼赴密，元素还朝，同行之京口而别，作此词。<sup>159</sup>此词乃是苏轼继〈菩萨蛮〉之后又一与杨元素离别所作之词，故上阙起言“分携如昨”表达出词人对此情此景深刻的记忆，此词悲怅的词调更甚于〈菩萨蛮〉。“人生到处萍飘泊”句，流露出浓烈的漂泊之感，因“萍无根，逐流而

---

<sup>159</sup>【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次韵答元素〉卷二十一，《苏轼诗集》第四册，页1114。另又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醉落魄·席上呈元素〉（分携如昨），《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124。

已，岂复有定居？”此言人生如萍在水，任其漂泊也。<sup>160</sup>词人此时心境并不仅仅徘徊于茫然、愁楚、苦闷之感中，而是更深一层的感受到一份无系之绳、随波逐流、漂泊浪迹之感，充满了消极的色彩。下阕“天涯同是伤沦落”句，化用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sup>161</sup>，此乃言两人现时同处“天涯”为“伤沦落”之人，而“故山犹负平生约”句，于白居易〈寄天质夫〉有云：“去处虽不同，同负平生约。”<sup>162</sup>两人原已约定要早日返回故乡的约定，因天涯同沦落的境遇，都无法遵守约定，而苏轼与杨元素皆是蜀山人却不能回蜀山，唯有抱着“西望峨眉，长羡归飞鹤”的叹息。

三首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既有茫然感，亦有距离感，然而最为浓烈的莫过于漂泊感，然这一漂泊之感，乃是基于“致君尧舜”那壮志未酬，忠而见疑的愤慨之下油然而生的。

---

<sup>160</sup> 见于注二，鄒同庆、王宗堂著：〈醉落魄·席上呈元素〉（分携如昨），《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124。

<sup>161</sup>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注：〈琵琶行〉卷十二，《白居易集笺校》第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页686。

<sup>162</sup>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注：〈寄天质夫〉卷十一，《白居易集笺校》第二册，页585-586。

## 二、“天涯流落思无穷”的悲哀感

第五首，〈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恍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徧。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sup>163</sup>

王文诰《苏诗总案》卷十七：“（于）元丰元年（1078）戊午，十月十五日，观月黄楼，席上次韵，梦登燕子楼。翌日，往寻其地，作《永遇乐》词。”<sup>164</sup>苏轼自熙宁四年（1071）以来，继接任杭州通判、密州知州，其时正从密州改知徐州，由于仕途上的波折和远离政治中心，加以频繁迁调，孤寂落寞之感不时袭上心头，以致使他向往探寻心灵自由之处，词人由夜梦燕子楼生发出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慨。

题名中的“燕子楼”乃唐贞元中（785-805）张愔镇徐州，筑此楼以居家妓盼盼，张死后，盼盼不嫁，居此楼十馀年。<sup>165</sup>词中上阙以景开端由此生发，融情入景，描写在燕子楼所见之夜色，月光皎洁如霜、清风和适，犹如走进清幽境地。随

<sup>163</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明月如霜），《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47。

<sup>164</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明月如霜），《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48。

<sup>165</sup> 见于注一，鄒同庆、王宗堂著：〈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明月如霜），《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 248。

即由大景入小景，“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句隐含了多重的艺术效果呈现于词中：一为，形态美“曲”与“圆”；二为，动态美“跳”与“泻”；三为，视听感观之美“鱼跃落水之声”与“露滴入水之声”。鱼跳暗点人静，露泻可见夜深，词人以动衬静，使原已寂静之夜越发显得静谧，而“寂寞无人见”句进一步说明鱼跳之忽现、露泻之细微此般寻常之景，若非幽人独处留心亦难查视。接着转从听觉写出：击鼓三响，叶落铿然，词人从梦中惊醒，顿然神伤，“欸如”与“铿然”皆是形容“夜深”与“叶落”的声态状貌，然而两厢的组合于词中所形成的却是强烈的不协调，继而方才能引发“梦云惊断”那黯然失魂的艺术效果。漫漫长夜，词人于夜梦中惊醒，欲续断梦却无可复得，起身踏遍小园以自遣，词中“茫茫”不仅写景亦写词人梦醒后的茫然之情。

上阙重在记梦以建构出形象画面，而下阙则重在抒发梦后感慨。启头“天涯倦客”引领出词人的内心世界，“倦”字道出内心的无限惆怅与忧烦，七年的外任生涯，久别京城，“望断故园心眼”更是流露出浓烈的欲归不得却归家期许之情。而“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句，乃言当年坚守挚爱不悔，独守空闺的佳人已不再，发出历经时间变迁的洗礼虽物是但人却已非的感慨。词人经由此感慨而悟得“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以“旧欢”对“燕子楼”，以“新怨”对“楼中燕”，形成超越时空的古（唐）今（宋）对话，由此联想“异时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的情景，词人将词思从燕子楼推演至黄楼，由今日

（苏轼之时）推及未来（苏轼逝时）。黄楼，在徐州城东门上，乃苏轼守徐州时拆霸王厅建之，为解除徐州水患的威胁。而“黄楼”之名于秦观《黄楼赋引》提及：

太守苏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又因修缮其城，作黄楼于东门之上，以为水受制于土，而土之色黄，故取名焉。<sup>166</sup>

可以从中体会到苏轼修筑黄楼的深意。复看词人所表达的深意，那“异时对”乃是设想后人面对黄楼凭吊自己时，亦如同自己今日面对燕子楼凭吊盼盼<sup>167</sup>，抒发出“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sup>168</sup>的感慨。词人把对历史的咏叹、对现实以至未来的思考巧妙的结合在一起，自古贯今亦延及后世，从而解开由政治波折所带来的精神枷锁。词中所描写小园清幽的夜景为上阙的主体，下阙则围绕燕子楼的情事而生发，词人将景、情、理溶于一词中，景中有情，情景交融，情中有理，以理化情。<sup>169</sup>词人悟得古今同梦，将情为理化，从郁郁寡情之羁绊中解脱而出，不论是小园清幽之景，或寻觅美梦、故乡、佳人之情，又人生如梦之理，都在词中得到有机地结合。

---

<sup>166</sup> 【宋】秦观撰，徐培均笺注：〈黄楼赋引〉卷一，《淮海集笺注》上册，页7。

<sup>167</sup> 见于注八，鄒同庆、王宗堂著：〈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明月如霜），《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49。

<sup>168</sup> 【晋】王羲之著，【清】吴楚材、吴调侯选注，安平秋点校：〈兰亭集序〉，《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87，页266-267。

<sup>169</sup> 吴慧娟著，唐圭章等主编：〈永遇乐·彭城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页706。

由此词领出端倪，于苏轼遭到“有旨不许入国门”的对待后囿于“天涯”之际的心境，从自视“倦客”这一点上，即可知此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仍是带有地方上与京师间“天样远”、“远似天”的感慨。

第六首，〈江城子·恨别〉：

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为问东风馀几许？  
春纵在，与谁同！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  
通。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sup>170</sup>

傅藻《东坡纪年录》：“（于）元丰二年（1079）己未，二月，移知湖州，别徐州作《神江子》。”<sup>171</sup>苏轼于熙宁十年（1077）四月调知徐州，五月到任，历时近两年，元丰二年（1079）三月由徐州调往湖州。解其题名“恨别”，顾名思义，此词所抒发的就是苏轼对徐州风物人情那留恋不舍之情。

词开端便以无奈、感慨作基调，因朝命而流落天涯的无奈之感，于心绪中充满愁思，无穷无尽。苏轼外任多年，已有“人生到处萍漂泊”、“天涯同是伤落人”的感慨，于去年作〈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中已自叹“天涯倦客”，次年再叹“吾乃天涯流落之人”。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路途折腾，往来涉走，

<sup>170</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江城子·恨别〉（天涯流落思无穷），《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62。

<sup>171</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江城子·恨别〉（天涯流落思无穷），《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62。

于此更添“天涯流落”之感，犹是可知，词人那“天涯流落思无穷”对猝然调离徐州发出无奈与感慨之声，此词调起句激动慨然，可见词人多时抑郁腔中的苦闷，一泻而就成为词句倾吐快之。而“既相逢，却匆匆”所写乃是与徐州人士交往情况，虽能相逢但时光短暂，匆匆间便要离别，词人对邂逅的喜悦与分离的痛苦溢于其中。对于徐州官员与友人为他设宴饯别的场面，词人并无正面描写人之情与宴之景，仅猎取“携手佳人、和泪折残红。”这一微小动作与情态作为饯别时的景象，词人对这一细微之处有所察觉，必然心中充满依恋、辗转不忍离去。由“残红”继而想到“残春”，便问“东风馀几许？”这一问表露出词人内心对时间流逝的热切关注，换言之，即是希图东风不要停，犹言东风停乃是离别之时。然而，最后词人自问纵使春光仍在，离开徐州又能同谁欣赏春景？通过设写离徐后所生的孤寂，从而对应出对徐州的依恋。

由此可见，苏轼对徐州的热爱，在徐州任上苏轼最为辛苦，时值熙宁十年（1077），黄河决堤，水淹四十五个州县，三十万顷良田，徐州城下水高二丈八尺，上任未及三个月的苏轼全力组织抗灾，他劝导逃亡人民返回城中，然后草履竹杖访当地驻军，召军队与人民一起筑堤护城，当暴雨如注，水势增高，城墙危在旦夕之际，奋战两月，方得水退城安，复上报朝廷要求增筑旧城，以防河水复来，另外，他还派人勘明附近的石炭产地，组织开发，以解决州人的御寒问题。<sup>172</sup>虽相处甚短但经由大难而与人民结下生死与共之情谊却是难以消磨的，前文提及苏轼有词

---

<sup>172</sup>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80。

〈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中所言：黄童、白叟、采桑姑、络丝娘以及人民农耕生活景致，乃经由词人的切身观察与融于其中而汇成词句。此外，苏轼甚有终老徐州之意<sup>173</sup>，然纵观苏轼后来的人生经历，这一“终老徐州”始终没有达成。

词中上阙写得处处真情真意，而下阙则重在以景寓情，接续上阙未了之情。

“隋堤”乃是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开通济渠，引汴水入河，与淮水沟通。渠广四十步，堤筑御道，并植杨柳，后人谓之隋堤。<sup>174</sup>苏轼有作〈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sup>175</sup>诗中言及苏轼由汴河水路离开徐州。“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泗与淮通。”乃苏轼赴湖州舟行景色，看见因春季而北归的大雁，然词人却南去吴中即是湖州，如是客观，一曰背，二曰归，三曰回首，透露出词人心之向往如雁北归，但此时却是往相背方向前行，脚步虽前进，但不断回眸遥望徐州城，已曝露出心之不舍之情，回顾间中，唯见清澈的泗水游经徐州流入淮水，此时“睹水思城”、“触水生情”，思念徐州之心见于诸词。结句如似南唐后主李煜〈虞美人〉：

---

<sup>173</sup> “余为彭城二年，乐其风土，将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厌也。将买田于泗水之上而老焉。”见【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灵璧张氏园亭记〉卷十一，《苏轼文集》第三册，页368。

<sup>174</sup> 见于注三，鄒同庆、王宗堂著：〈江城子·恨别〉（天涯流落思无穷），《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63。

<sup>175</sup> “古汴从西来，迎我向南京，东流入淮泗，送我东南行。”见【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卷十八，《苏轼诗集》第二册，页935。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sup>176</sup>

李煜词之意，尚有江水为传情递意，而苏轼词“寄我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词人欲托清泗流水将饱含深情密意的思念寄往徐州，然事与愿违，千点相思泪无法送达，只因楚江向东流。

有英雄壮志未酬而仰天长啸，而在此有词人相思难寄而怅然失意，不禁令人感发百般怅惘与沉痛，而这一切只因“天涯流落”身不由己之故，然此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充满的是惆怅与愁思。

### 三、“天涯踏尽红尘”的自我肯定

第七首，〈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二首·其一〉：

海上乘槎侣，仙人萼绿华。飞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头来处、渺天涯。雷  
辊夫差国，云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写取馀声归向、水仙夸。<sup>177</sup>

此词乃苏轼在元祐五年（1090）八月，作于杭州<sup>178</sup>，顾名思义，此词乃描写观潮之盛景，在每年的农历八月十八日，是杭州钱塘江潮水最为壮观之时，人们会到此乘

<sup>176</sup> 【南唐】李璟、李煜著，王仲文校订：〈虞美人〉，《南唐二主词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11。

<sup>17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二首·其一〉（海上乘槎侣），《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620。

舟划浪，亦有深识水性的好手能戏于潮头浪尖上，犹如现今的冲浪运动，在宋代的民俗著作中，如《梦梁录》<sup>179</sup>等有此记载。词上阙所特写的乃是一名穿游于浪墙上的人，词人极富神话似的描摹此人自由自在的戏水功夫，娴熟的冲浪技巧，稳健的操纵身姿，轻灵身影，忽隐忽现，无所畏惧，一“住”字更具形象式的表现出弄潮人那神乎其技的水上功夫。上阙重在描写视觉的感受，而下阙则重在以听觉方面落笔，下阙启句乃是着眼抒写潮声所引发的地动山摇之气势，其声响波澜壮阔，令人心也为之振奋了起来。

据此分析而得出，此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并无多大的意涵，仅是潮浪中花海翩起而形成视觉上的渺茫感。于此继看下词，或可从中得出另一答案：

苒苒中秋过，萧萧两鬓华。寓身化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 方  
士三山路，渔人一叶家。早知身世两赘牙。好伴骑鲸公子、赋雄夸。<sup>180</sup>

此词亦是作于同一时期乃〈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二首·其二〉为和唱前此之作。与前词重在描述钱塘观潮的风俗不同，此词重在抒写词人自身的情怀。因岁月催人老，故而两鬓霜白，然“笑看”二字于中其实包涵了许多苦涩滋味。“寓身化世一尘沙。笑看潮来潮去、了生涯”句，抒发了人生在世的感慨，将人视为海

<sup>178</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二首·其一〉（海上乘槎侣），《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621。

<sup>179</sup> 【宋】吴自牧著：《梦梁录》卷二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页245。

<sup>180</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二首·其二〉（苒苒中秋过），《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624。

中之一粒沙石，随着潮起潮落而流动，然此处所言之“潮来潮去”乃喻仕途中变化莫测的政治斗争、人际纠葛、官职升降等。仅上阙便接连哀叹岁月的流逝、自身的渺小、仕途的艰辛与壮志未酬的愤懑。然而，“笑看潮来潮去”于中也表现出淡于功名利禄的心态，面对尘世的失意，心灵失去依托，词人遂而将身心寄托于尘世之外的世界。下阙描写词人寻求心灵寄托，不论选择修炼方术还是下海为渔父，而“早知”二字已透露出两者皆非词人心之向往，然而“早知身世两鬓牙”句，乃是对理想抱负之追求与自身所遭受之命运的两厢抵触，流露出无奈的悔恨，结句乃是词人心之向往，“好伴骑鲸公子、赋雄夸”即愿伴随李白一起隐遁，舞文弄墨，表达出了欲超然物外，摆脱尘俗种种羁绊的迫切心情。

由此词中的“了生涯”复看前词中的“渺天涯”，而那一“渺”字对苏轼来说透露出的是一种广阔无边际的凡尘俗世。

第八首，〈临江仙·送钱穆父〉：

一别都门三改火，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

惆怅孤帆连夜发，送行淡月微云。尊前不用翠眉颦。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sup>181</sup>

---

<sup>181</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临江仙·送钱穆父〉（一别都门三改火），《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665。

苏轼此词作于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春，时任杭州知州。<sup>182</sup>苏轼有作〈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该注云：“钱穆父以龙图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坐奏狱空不实，出知越州，时元祐三年（1088）九月也。”<sup>183</sup>元祐五年（1090）十月，徙知瀛洲<sup>184</sup>，次年春启行，途经杭州时，苏轼以此词赠行。

词上阙写与友人久别重逢。因岁月如流，光阴飞逝，此刻杭州重聚已是别后的第三个年头，而三年来，钱穆父奔走于京城、吴越之间，此次又远赴瀛洲，犹如词中言“天涯踏尽红尘”，苏轼此时已是暮春之年，然此句不也正是诉说着自身那在朝野奔波的无奈之慨，尝尽人世间的苦辣酸甜，此时别有似是“天涯同是伤沦落”之感，在天涯之际相逢故友乃人生一大乐事，两人虽分别甚久但一见钱穆父的笑容依然，如春温一亲暖人心头，可知两人情比金坚，然借由词人如此描述与钱穆父重逢的情景，犹可知面对红尘的纷扰似乎没有在钱穆父的脸上留下任何痕迹，故可面容和暖，笑待故友，而“无波真古井，有节是秋筠”说的就是此事，谓钱穆父不为仕宦沉浮而忧喜，面对官场纷争其心境依能平静无波澜如古井之水，其气节概如秋筠，此句乃化用白居易《赠元稹》诗：“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sup>185</sup>词人不仅赞颂对方同时亦赞颂自己。苏轼出任杭州与钱穆父出守越州，两人乃基于在朝好议论政事，因树大招风引起其他政官的不满与舆论，苏轼认为“欲息波澜须引去，吾

---

<sup>182</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临江仙·送钱穆父〉（一别都门三改火），《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665。

<sup>183</sup> 见【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送钱穆父出守越州绝句二首〉卷三十，《苏轼诗集》第五册，页 1589。其事又见【宋】王偁著：《东都事略·钱勰传》，《四库全书》本。

<sup>184</sup> 详见【元】脱脱著，《钱穆父传》卷四百四十九，《宋史》第三十八册，页 13267。

<sup>185</sup>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注：〈赠元稹〉卷十一，《白居易集笺校》第一册，页 20。

济岂独坐多言”<sup>186</sup>，而钱穆父到越州“卧治何妨昼掩门……闭眼丹田夜自存”<sup>187</sup>。

苏轼欣赏钱穆父那不同流合污的气节。

上阙写得慷慨、高节，然而，此为送别之词，故下阙转写月夜送别友人，起句不免惆怅、惋惜，送别友人之际词人不仅无心感孤寂、落寞，笔锋一转，“尊前不用翠眉颦”，其意欲言此次临别是为再待下次的重逢，除此，亦是不想增加双方临别的愁思、不舍之情。宋代州郡长官筵席，例有官妓，而在送别筵席上，歌妓最为容易动情，故苏轼词中不时会有劝以“不用敛双蛾”<sup>188</sup>、“红粉莫悲啼”<sup>189</sup>与此“尊前不用翠眉颦”同一用意。结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句，能从两个方面来看，李白有《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云：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sup>190</sup>

既然人人都是天地间的过客，又何必为此刻的聚首、离别而感伤，以此角度来看此句的话不免带有消极的成分。叔本华有言：

---

<sup>186</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次韵钱越州见寄〉卷三十一，《苏轼诗集》第五册，页1651。

<sup>187</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次韵钱越州见寄〉卷三十一，《苏轼诗集》第五册，页1651。

<sup>188</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菩萨蛮·西湖送述古〉（秋风湖上萧萧雨），《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81。

<sup>189</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好事近·黄州送君猷〉（红粉莫悲啼），《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469。

<sup>190</sup>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卷二十七，《李太白全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页1292。

拒绝投降和同流合污的人注定是孤独的，他确信自己的优越，所依据的是内心对自我价值的体认，并不以外来的价值作为尺寸和依据。<sup>191</sup>

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所看到的则是积极的一面，苏轼生发那浮生飘零、聚散无定的悲慨，乃是壮志难酬、蹉跎无所成之下的产物，然而，之所以背负辗转流离的命运，则是为了不懈对自我价值的求证，但事实上愈求索愈失落，然愈失落就愈执着。<sup>192</sup>所以对于词人以“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作为送行结句来看，于中带有的一种抚慰友人心与此同时聊以自慰的倾向，借此表达出与友人所面对的是相同的境遇，人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犹如逆风而行之旅，亦犹如逆水而上之舟，自明逆行却仍然坚持故我，深知行于逆中不进则退的道理，为坚守节操即便逆旅，亦得行于其上。

结句所带出的意涵不仅能为远行的友人于往后之路提供一种精神上的内在力量，同时亦是一种自我对“天涯踏尽红尘”的肯定，此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执着与坚持。

---

<sup>191</sup> 叔本华著，范进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页45。

<sup>192</sup> 尚永亮、张娟著：〈孤鸿情节：观照苏轼其人其词的一个新视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页352。

#### 四、“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豁达精神

第九首，〈蝶恋花·春景〉：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sup>193</sup>

此词乃是苏轼在绍圣二年（1095）春，作于惠州。其题名实为“春景”，然并非吟咏“春”之盛媚，而是描写暮春之景，春夏之交的时令。词上阙由描写暮春景色勾起伤春心绪，触目红花纷谢，青杏初结，柳绵日少，普天芳草，充满了繁华易逝，犹有“流水落花春去也”<sup>194</sup>之意。词下阙写伤情，借“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意象，寓有对朝廷一片忠心却被贬官远谪的惆怅，含蓄地表达出词人仕途坎坷的失落之情。在感叹春光流逝之际，于中隐隐流露出词人自身的失意情怀与旷达的人生态度。

词上阙启句“花褪残红青杏小”点明时值春夏之交，以“青杏小”接替“花褪残红”，即写衰亡亦写新生，从而揭示出了春花殆尽、青杏始生的自然界新陈代谢

<sup>193</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753。

<sup>194</sup>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暖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见【南唐】李璟、李煜著，王仲文校订：〈浪淘沙令·帘外雨潺潺〉，《南唐二主词校订》，页65。

谢的规律。“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句，晏殊《破阵子》有曰：“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sup>195</sup>词中“燕子来时”乃指节序是在春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与首句相印合，而“绿水人家绕”句，带出人烟和暖的气息，此处“人家”似有意为下阕的“佳人”做伏笔。“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先抑后扬，一跌一起，而“枝上”句与“花褪”句同属一组，词人在词中不作排序之用，想必于中不愿让伤春情绪处于低靡，用意串联“绿水”句为和暖伤春氛围。然而，此处的形象概括乃是枝上的柳绵被风吹得越发渐少，那一着眼“又”字可见词人伫视之久，抑或此番景象“又”重历在目。而“天涯何处无芳草”，表面似乎道尽春光已晚，芳草盛满天涯，然而，实则化用《离骚》：“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sup>196</sup>之语，言下之意，可谓只要豁达任适，处处皆是栖身之所。又《和蒋夔寄茶》：“我生百事常随缘，四方水陆无不便。”<sup>197</sup>就苏轼之后贬谪岭南时期的心境：“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sup>198</sup>在困顿之境、思乡之绪中蕴含着随遇而安的旷达情怀。

若果上阕于写景中寄托伤春之感，而下阕乃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那般抒写闻声却不见佳人的懊恼和惆怅。下阕所言“墙里”乃接续上阕所言之“绿水人家绕”，由于绿水之内环以高墙，墙外道上行人（词人）只能见着墙里露出的

---

<sup>195</sup> 【宋】晏殊著：〈破阵子〉，《二晏词》，页 98。

<sup>196</sup> 【楚】屈原著，金开诚等校注：〈离骚〉，《屈原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页 120。

<sup>197</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和蒋夔寄茶〉卷十三，《苏轼诗集》第二册，页 653。

<sup>198</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卷四十三，《苏轼诗集》第七册，页 2366。

秋千架，却无法看见在墙里欢笑的佳人的容貌姿态。结句“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乃是对佳人离去后所作的自我嘲讽。伫立墙外的行人欲多闻墙内佳人欢声笑语，然墙内佳人此刻却声笑渐远渐消，由此生发自作多情之慨然。苏轼一生忠而见疑，直而见谤，屡遭贬谪，也正是“一片忠直之多情，却被疑谤之无情打击”，此番嘲弄乃是抒发加之自身诸多不公的命运。

从上述分析当中，能归结出几点冲突之处：一为，“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前者情感极为低沉，后者则表现出乐观精神；二为，“天涯”句揭示出苏轼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矛盾情结。三为；行人多情而佳人无情间的冲突。由众多起伏情绪交织而成，然对于此词有段事迹记载，《林下词谈》云：

子瞻在惠州，与（侍姬）朝云闲坐。时青女初至，落木萧萧，凄然有悲秋之意。命朝云把大白，唱“花褪残红”，朝云歌喉将啞，泪满衣襟。子瞻诘其故，答曰：“奴所不能歌者，是‘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也！”子瞻翻然大笑曰：“是吾政悲秋，而汝又伤春矣”。<sup>199</sup>

清人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二引《东坡集》：“东坡制《蝶恋花》词……长令朝云歌之。云唱至“柳棉”句，为掩抑惆怅，如不自胜。坡问之，曰：‘妾所不能竟

---

<sup>199</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754。

者，天涯何处无芳草句也。’ ”<sup>200</sup>由此记载可知，若果朝云所悲泣之原因乃伤春所致，复看“枝上柳绵吹又少”其词实为悲怅，然而连“天涯何处无芳草”如此生机盎然之景，亦泪满衣襟，想必有所体会苏轼那固中错综复杂的滋味，体会那包含其中对于现实的旷达思想与对于理想未酬的感伤，两者间相汇杂的情怀。苏轼此时年六十，于朝野来往返去已是半百人世間，最终感到有所能安于惠州，并在绍圣四年（1097）二月入住用积蓄购置的新居<sup>201</sup>，其时六十二岁的他造房安家以图终老惠州。

由此可知，此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是一种寄寓了豁达乐观的思想情感，即便世事总是“多情”反倒“无情”忧扰，却能够在随遇而安的态度之下得到消解。

第十首，〈减字木兰花·立春〉：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 一

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杨花似雪花。<sup>202</sup>

<sup>200</sup> 见于参考资料，鄒同庆、王宗堂著：〈蝶恋花·春景〉（花褪残红青杏小），《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755。

<sup>201</sup>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见【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和陶时运四首诗·并引〉卷四十，《苏轼诗集》第七册，页 2218。

<sup>202</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减字木兰花·立春〉（春牛春杖），《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801。

傅澡《东坡纪年录》：“（于）元符三年（1099）己卯，公在儋州，立春日作《减字木兰花》”<sup>203</sup>立春，即以此题名。海南岛于宋代之时乃为蛮瘴僻远的“海角天涯”之地，然而，苏轼于词中所描绘的，并非是面对异乡荒凉景色所兴起的飘零流落之悲感，而是处处洋溢着春天气息“春牛、春杖、春工、春幡、春胜、春风”，以欢快跳跃的笔触，突出了边陲绚丽的春光和蓬勃的大自然，处处生意盎然。由此可见，苏轼对异地风物的热爱，并非因贬谪之由而处于此地便生发排斥与敌视的眼光。结句“不似天涯。捲起杨花似雪花。”傅注：“桃红杨花，每见仲春之时，南海地暖，芳春已盛。”<sup>204</sup>词人将风捲起的杨花比作像似雪花，可见其时春景所开杨花之盛，然“不似天涯”一句，或有打破旧有对儋州有蛮瘴僻远的“海角天涯”之地的观念，由此来看，苏轼此番贬谪实属“流放海角天涯”<sup>205</sup>，但对苏轼来说这不仅并非苦事，反之能与大自然融合亲近乃人生又一大乐事。

然而，于此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有作《到昌化军谢表》<sup>206</sup>一文，由此可知，苏轼乃绍圣四年（1097）七月抵达贬所，然根据《苏轼词编年校注》所编此词是作于元符三年（1099），两厢资料显示，苏轼到贬所与作此词间隔近一年半的时间，然

---

<sup>203</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减字木兰花·立春》（春牛春杖），《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801。

<sup>204</sup> 见于注七，鄒同庆、王宗堂著：《减字木兰花·立春》（春牛春杖），《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803。

<sup>205</sup> 海南岛自古有“海角天涯”之称，是宋代贬谪士人的极限，而在这里“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的苏轼（见【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二十二，《苏辙集》第三册，页1126。），则为此种“谪居文化”创造了一个最高的典范。这种典范的意义，也许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曰：亲近大地。见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126。

<sup>206</sup> 见【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到昌化军谢表》卷二十四，《苏轼文集》第二册，页707。

而，苏轼在这一年半中完全没有任何词作吗？据《苏轼词编年校注》所收，苏轼有〈西江月·中秋和子由〉一词：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  
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然北望。<sup>207</sup>

乃于绍圣四年（1097）八月十五日，作于儋州<sup>208</sup>。此词可视为苏轼初到儋州的心声词。此词启句“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所带出的词调，与后来所作的词调“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大相径庭，然而为何有如此差异？或能有两点说明之：一为，中年时期的“乌台诗案”，晚年时期的“元祐党人”，当苏轼买宅终老惠州之际，却人算不如天算，绍圣四年（1097）二月，朝廷又一次大规模追贬“元祐党人”，将苏轼贬谪儋州，其临行感“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sup>209</sup>。正如《苏轼年谱》所云，“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乃是词人遭受极大的身心与精神上的打击之下所生发的感慨。二为，“月明多被云妨”乃是指苏轼在官场上屡屡遭致小人谗言，而使他在君主面前的一片忠心被谗言蒙蔽。这两大因素不断消磨着苏轼，加之人生地疏不如黄州之时，故致使初到蛮荒之地的儋州，倍感凄凉。在贬谪黄州之时，对于宋神宗的赏识仍报持着一线希望，然贬谪惠州、儋州之时，

---

<sup>20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西江月·中秋和子由〉（世事一场大梦），《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798。

<sup>208</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西江月·中秋和子由〉（世事一场大梦），《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798。

<sup>209</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与王敏仲十八首之十六〉卷五十六，《苏轼文集》第四册，页1695。

赖以支持的精神力量便转为来自普天之下的人民了。<sup>210</sup>从苏轼多首词作中不难发现，其心易与大自然契合，犹是描写地方上的山水风物与农村景致，寓情于景，借景抒情，正如苏轼有言“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比怪奇伟丽者也。”<sup>211</sup>即便在蛮荒的儋州亦有可观，此外，其中的精神依托不外乎对佛、道思想的汲取。

犹然可知，此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已并非是那带有地方上与京师间相隔“天样远”（第一首）、“两杳茫”（第二首）、“远似天”（第三首）的漂泊感；也不带有“伤沦落”（第四首）、“倦客”（第五首）、“流落”（第六首）的悲哀感；而是一名“踏尽渺渺红尘”（第七、八首）之士，并深知“何处无芳草”（第九首）的道理，视儋州“不似”（第十首）于蛮荒之地，而是处处充满生机。

第十一首和第十二首：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  
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  
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恣浮于海。<sup>212</sup>

——〈千秋岁·次韵少游〉

<sup>210</sup>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页116。

<sup>211</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超然台记〉卷十一，《苏轼文集》第二册，页351。

<sup>212</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千秋岁·次韵少游〉（岛边天外），《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803。

改火初晴，绿徧禁池芳草。斗锦绣、火城驰道。踏青游，拾翠惜，袿罗弓小。  
莲步袅。腰支佩兰轻妙。行过上林春好。    今困天涯，何限旧情相恼。念摇落、  
玉京寒早。任刘郎、目断蓬山难到。仙梦杳。良宵又过了。楼台万家清晓。<sup>213</sup>

——〈踏青游〉

以上两首的写作时间皆在元符二年（1099）作于儋州<sup>214</sup>。首先分析〈千秋岁·次韵少游〉，然此词为苏轼与秦观的唱和词，秦观〈千秋岁〉曰：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  
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鹓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  
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戏万点愁如海。<sup>215</sup>

秦观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其〈千秋岁〉词抒发的是离愁别绪，而苏轼和词则意在表达对远贬儋州的感慨，情感较为深沉。〈千秋岁·次韵少游〉的上阕，词人将自身所处言为“岛边天外”，自叹年未老功名未遂已先身退，于中寄予了无限恨悔。而，“珠泪溅，丹衷碎”写出词人遭贬的愤懑，而“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句，《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大夫佩水

<sup>213</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踏青游〉（改火初晴），《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806。

<sup>214</sup> 见于编年，鄒同庆、王宗堂著：〈踏青游〉（改火初晴），《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803、807。

<sup>215</sup> 【宋】秦观著，唐圭章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千秋岁〉（水边沙外），《全宋词》第一册，页 592。

苍玉而纯组绶。”<sup>216</sup>词人虽被贬但服饰冠带仍旧，怀思之情不言而喻，然“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表达出词人虽已是暮春之年，而此贬谪之远又无由北归，远在万里天涯，空望着斜阳所照之长安以此遥思京师。词下阙启句，自言此贬谪之罪大能盖天，虽君王的谪命甚重，但身为人臣的节操犹存。对于绍圣四年（1097）之时又一追加对元祐党人之罪的诏命，词人以“新恩”一反语觐之，由此可见，词人那大无畏的精神。而“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句，语出《论语》：“道不行，乘桴浮于海。”<sup>217</sup>词人虽屡遭贬谪，但不改其度，依然抱持着“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的自我态度。

此词启句虽有流落“岛边天外”的意味，与“未老身先退”的恨悔，然而，处于这一“岛边天外”对苏轼所带来的意义是一种自我态度的肯定，就算“罪大天能盖”终不改苏轼那“以天下为己任”之志。

然而，在〈踏青游〉中所表露出的词意为忆昔伤今之作。词上阙写“禁池”、“斗锦绣”、“驰道”、“上林”乃系于京师之景物，又写“踏青游”、“拾翠惜”、“袜罗弓小”、“莲步袅”、“腰支轻妙”实为宫嫔仕女、王宫少妇春游之景象，然而，能于上林禁苑中目见此番景象者，实属非下层阶级之士。而下阙转写“今困天涯”伶仃外岛，被历历“旧情相恼”，从而连连感叹“玉京寒早”、“蓬

---

<sup>216</sup>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玉藻〉卷十三，《礼记正义》中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页914。

<sup>217</sup> 程树德著，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公冶上〉卷九，《论语集释》第一册，页299。

山难到”、“仙梦杳”、“良宵又过了”，在天涯遥念已失落了的京师繁华盛世的美景生活，抚今追昔而无限懊恼。

此词中的“天涯”对苏轼来说带有惋惜之情，之所以生起此番情愫，与苏轼久经漂泊天涯至关密切。然而，由上述两首词所表达的词调得以看出贬儋时期的苏轼对“天涯”的意义不再流露出茫茫之感（第二首），而那一“困”字也并非苦诉着自身伤流落之倦（第四、五、六首），而是久别国都所生发的失落、惋惜之情。词中那“远之感”对词人来说并非愁苦（第一、三首），于中所生起的思想情感包含更多的是一种信念的执着与对理想的坚持（第十一），同时希图在有生之年还能复归京师（十二首）。因秉持着节操与忠心才能引领词人踏尽广远红尘（第七、八首）而不流入尘俗名利的漩涡，亦能豁达的走在遍野盛满芳草之地（第九首），面对蛮荒僻远之境仍怀抱处处充满生机（第十首）的乐观希望。由此可知，“天涯”这一意象在苏轼词中从原先带有浪迹天涯的漂泊感，而后经由在人生历程中对各种磨练的体验而有所变化，使得“天涯”的内涵处于不断深化的状态中，以致形成了“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豁达自适的精神境界。

## 第四章：“天涯”之际无黄州亦无归隐

苏轼将一生奉献于官场，其仕途之路坎坷曲折，得意之时“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犖，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sup>218</sup>；失意之时被陷牢狱，几近就死，远迁贬所，穿不暖，食不饱；即不容于新党，亦不能容于旧党。青年时期那“致君尧舜”的理想抱负未能得以施展、发挥便被纷至沓来的荣辱、得失、穷达、祸福于长时间的消磨心智，在这种种刺激、袭扰之下使苏轼饱尝人生喜悲、富贫、贵贱等各中的人生滋味。然而，此部分将着重论述在第三章分析苏轼词中出现“天涯”之词时，能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此先将那十二首词以表格的形式简介之：

相距时间	词作	写作时间	功用
第一首 “天涯” 之词	〈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	熙宁七年（1074） 七月	在杭州通判时期，为送别友人陈襄而作，抒发不得志的苦闷。
同时期	〈南乡子·和杨元素〉、 〈菩萨蛮·润州和元素〉、 〈醉落魄·席上呈元素〉	熙宁七年（1074） 九、十月间	作于杭州，与友人杨元素抒怀失意之志。

<sup>218</sup> 【元】脱脱著：《苏轼列传第九十七》卷三百三十八，《宋史》第三十一册，页10802。

隔4年	〈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	元丰元年（1078）十月	其时正从密州改知徐州，由夜梦燕子楼生发出古今如梦的人生思考与感慨，抒发久经尘世奔波的无限惆怅与忧烦。
次年	〈江城子·恨别〉	元丰二年（1079）三月	由徐州调往湖州，为离别徐州而作，抒发身不由己的恨悔。
隔11年	〈南歌子·八月十八日观潮和苏伯固二首·其一〉	元祐五年（1090）八月	杭州钱塘观潮，抒发欲隐遁之情。
次年	〈临江仙·送钱穆父〉	元祐六年（1091）春	时任杭州知州，为送别钱穆父而作，述写一种精神上的执着与坚持。
隔4年	〈蝶恋花·春景〉	绍圣二年（1095）春	作于惠州，抒发失意情怀与旷达的人生态度。
隔4年	〈减字木兰花·立春〉	元符三年（1099）立春日	作于儋州，述写豁达的精神与乐观的心境。
同时期	〈千秋岁·次韵少游〉和 〈踏青游〉	元符二年（1099）	作于儋州，述写自身的节操与忠心。

从以上简表能得知，苏轼在第一次与第二次的外任中，其词皆有提到“天涯”。然而，贬谪黄州之时乃其词创作最高峰，却无出现“天涯”二字，于贬谪惠州与儋州皆有提及“天涯”二字。而且，从十二首词中能看出苏轼不论是在心境上或精神上皆有所变化：第一次的外任对“天涯”所流露出的是苦闷、失意、忧烦、恨悔，这种种情感皆是负面的思想情绪。但至第二次的外任对“天涯”所表现出的却是欲隐遁的思想情感与执着、坚持的精神。贬居惠州、儋州其对“天涯”所抱持的是豁达、乐观、坚守节操与忠心的人生态度。然而，所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点：一为，为何苏轼黄州词无“天涯”二字；二为，深感倦世心态为何由始至终却无归隐之举。

### 第一节：黄州词作无“天涯”二字

在苏轼于黄州所作之词无出现“天涯”二字，这或许与其遭受莫须有之罪而面临贬谪的命运有关。在苏轼历经这一劫后余生，从狱中脱险之当日即写下：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灰低。寒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休官

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sup>219</sup>

---

<sup>219</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则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其二〉卷十九，《苏轼诗集》第三册，页1005。

面对无妄之灾对苏轼的人格精神打击犹重，本持着一片赤胆忠心为国为民却遭小人以莫须有之罪污蔑。在赴黄州途中，苏轼在麻城春风岭看见明艳高洁的梅花，触景生情，不禁自吟〈梅花二首〉：

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sup>220</sup>

第一首，诗人以歌颂梅花远离尘嚣的绰约风姿和傲然不群的品格，表露出诗人欲一展卓越才华，然而却如同夹杂在“草棘间”的梅花一样，尽管明亮鲜艳却无法径自施展的复杂心情。而“半随飞雪度关山”句，则表现出了诗人内心的失落，但诗人却并未因仕途失意而与如同“草棘”的乌合之众相交，依然坚持自我高洁的品格，犹如梅花盛开在草棘间般而不苟合。然第二首乃承接第一首，“开自无聊落更愁”句，抒写出诗人对梅花境遇的同情，于中流露出诗人内心的孤寂，此句犹言梅花即是诗人的化身。梅花独自盛开难免有感孤独，但花落之大幸乃落于清彻之溪而非污泥之沼。从梅花的寂寞而不流于淤泥的孤傲品格，仿佛寓意着诗人那独自占春芳、孤芳自赏的孤清和高傲的性格。

---

<sup>220</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梅花二首〉卷二十，《苏轼诗集》第四册，页1026-1027。

除此，苏轼也有已“红梅”自喻：

好睡慵开莫厌迟。自怜冰脸不时宜。偶作小红桃杏色，闲雅，尚馀孤瘦雪霜姿。休把闲心随物态，何事，酒生微晕沁瑶肌。诗老不知梅格在，吟咏，更看绿叶与青枝。<sup>221</sup>

词中所强调的红梅盛开之不合时宜与其品格之不流于俗，为说明词人那孤芳自赏与傲骨不逊的节操。然苏轼〈卜算子〉一词：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sup>222</sup>

词中的孤鸿意象不仅是词人的心迹，亦是苏轼孤鸿情节的典型表征。<sup>223</sup>

在苏轼第一次自请外任之时，乃基于不容于朝而作的决定，然而，在外任期间却遭逢政敌的诬陷。在王安石罢相之后，御史台的官员如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新进的官僚，就抓住他写在诗文中的一些词句，并虚构罪状，弹劾他“作文章，谤君王，讥时事，藏祸心。”因此在元丰二年（1079）将他从湖州逮捕入狱，定他诽谤

---

<sup>221</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定风波·咏红梅〉（好睡慵开莫厌迟），《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462

<sup>222</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275。

<sup>223</sup> 尚永亮、张娟著：〈孤鸿情节：观照苏轼其人其词的一个新视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二辑，页354。

朝廷的罪行，便酿成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苏轼因这场文字狱而受到精神上严重的打击，基于自身孤高傲世的品格，面对如此的诽谤与诬陷，而致使他被贬到黄州为团练副使，于中的挫折感与其孤傲不群的性格相互矛盾着，因自身妄受谪贬而至黄州，故于词中所流露出的思想情感并无浓烈的“浪迹天涯”与“漂泊海角”的意味，于中更多的是急于寻求一种身心解脱的精神世界。

## 第二节：倦世心态仍无隐遁之举

在苏轼的词中多有倦世的心态，然而却由始至终没有真正实践归隐的想法，这或许与苏轼深受儒家那忠君报国的思想相关。苏轼以前代名臣为榜样“奋厉有当世志”，儿时仰慕范滂的事迹在第二章的书香世家部分已有叙述。此后又在《上梅直讲书》和《范文正公集叙》中提及，入乡校时已受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这四为当代名臣的影响，故而能“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胸怀大志，怀抱着能在政治场上一展才华。然而，始料未及的“乌台诗案”让苏轼几欲就死，却承蒙神宗的惜才之情，在叶梦得的《石林诗话》有段记载：

苏轼下狱，宰相王珪言苏轼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蜚龙知”

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sup>224</sup>

由此可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党争局势，其后，有鉴于神宗“人材实难，不忍终弃”<sup>225</sup>故而将苏轼量移汝州为团练副使。苏轼在词中也有表露出君恩未报的思想：

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画楼东畔，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船头转，长风万里，归马驻平坡。无何。何处有，银潢尽处，天女停梭。问何事人间，久戏风波。顾谓同来稚子，应烂汝、腰下长柯。青衫破，群仙笑我，千缕挂烟蓑。<sup>226</sup>

此词有段苏轼所写之序：“余谪黄州五年，将赴临汝，作《满庭芳》一篇别黄人。既至南都，蒙恩放归阳羨，复作一篇。”<sup>227</sup>除此，在苏轼的文章中也有如此思想：

臣昔于治平中，自凤翔职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骤用臣。当时宰相韩琦以臣年少资浅，未经试用，故且与馆职。亦会臣丁父忧去官。及服睽入覲，

<sup>224</sup> 详见叶梦得著：《石林诗话》

<sup>225</sup> “神宗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见【元】脱脱著：《苏轼传》卷三百三十八，《宋史》第三十一册，页10822。

<sup>226</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568。

<sup>227</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苏轼词编年校注》上册，页568。

便蒙神宗皇帝召对，面赐奖激，许臣职外言事。……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犹欲驱使，或除一重难边郡，臣不敢辞避，报国之心，死而后已。<sup>228</sup>

由此可知，苏轼即便身处天涯之际，亦不敢辞避更无能归隐，只因着一片报国之炽热之心。由是可观，即便身处蛮荒僻远之儋州，苏轼仍能怀抱着对信念的执着与对理想的坚持，其至关紧要的内在因素即是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对佛、道思想的倾心乃是基于一种寻求精神解脱的方式，由此形成达观的思想并不等于放弃，所以对于苏轼向往陶渊明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sup>229</sup>的田园生活，也仅止于向往，并没有确实的付诸于实践，其一生并无真正的如同陶渊明一样“归隐”，而是通过诗词以抒发其“一肚不合时宜”的牢骚。苏轼有作〈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醉复醒，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常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sup>230</sup>

对此词有段趣闻记载：

---

<sup>228</sup>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杭州召还乞郡状〉卷三十二，《苏轼文集》第三册，页912。

<sup>229</sup> 见【晋】陶潜著，杨勇校笺：〈饮酒二十首之五〉，《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页144-145。

<sup>230</sup> 鄒同庆、王宗堂著：〈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醉复醒），《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467。

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挈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遏。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然此语卒传至京师，虽裕陵（神宗）亦闻而疑之。<sup>231</sup>

由此段事迹的记载来看，苏轼那“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想法，仅在“醉复醒”与“鼻鼾如雷”的瞬间念头。

苏轼的思想以儒家为本，又兼取佛道之长，坚守儒家思想而不迂执，然好道却不带有出世的想法，参悟禅宗的哲理又不虚妄度日。苏轼虽多次遭贬，壮志难酬，但对未来亦不间断的从绝望中重试怀抱希望之心，在这样来回徘徊于绝望与希望之间，故不时流露出厌倦仕宦，向往农村田野的心情，也不时寄情于佛老思想以得到自我宽慰。

---

<sup>231</sup> 【宋】叶梦得著：《避暑录话》卷上。见于参考资料，鄒同庆、王宗堂著：〈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醉复醒），《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册，页 468-469。

## 结语

词从仅为配合歌舞乐曲之用的功能，晋升为能承载人生命题的载体，此乃词体创作上的一大革新与突破。然而，苏轼之所以能有此文学造诣，无不与坎坷的仕途命运有关。

苏轼一生深受儒、道、佛思想的影响，尤为对老庄思想情有独钟。然而，历经宦海沉浮之后，其思想也逐渐产生变化，从青年时期“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犹重的功名心，至中年时期开始反思自己以功利之心入世为官的价值理念，遂而摒弃此弊病，并自我重新审视，基于对自身的人生价值观有所顿悟，而能令自己在谪居黄州生涯期间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即是面对困厄抱持“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悠然态度。而这一思想在晚年流放天涯于惠州、儋州之时更加深化，从悲观到达观、从迷惘到豁然开朗的心路历程，最终达至以归属自我为人生终极的价值，即是“此心安处是吾乡”。

对于苏轼在天涯之际的心境与精神状况，从其词中能窥探一二，虽然从《苏轼词编年校注》中的二百九十二首词中出现“天涯”二字或与之相近意之词的仅有十二首，但经由分析解读中仍能有所收获，从中能了解“天涯”对苏轼的人生意义，从第一次外任的漂泊、流落、倦客的思想情感能看出，苏轼对自身定位的归处的焦虑与仕途前景的茫然，直到第二次外任的自我肯定，甚至贬谪惠州、儋州的豁达自

适与对信念的执着和理想的坚持，便可看出其心境上与精神上对“天涯”的意义又负面趋为正面，这一间中的转变无疑是家学涵养人格的结晶与儒、道、佛互补思想的产物。

然而，苏轼之所以由始至终没有真正的走上归隐的道路，由此可见，儒家的忠君报国方是苏轼入世的主导思想，在苏轼看来，佛、道思想仅是慰藉人们在无常的人生中多有人之所不可能为之事的无奈。对于苏轼遭受“乌台诗案”这一无妄之灾，在理想与现实两厢抵触的情况下，儒家思想退居，而佛、道思想便位居上位以填补因现实的失意而在精神上所遗留下的空缺，然而，“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乃是苏轼矢志不渝的。

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正月四日，苏轼度大庾岭北归，欲或归阳羨、或颖昌养老，闻朝内时论已变，最后决定归常州<sup>232</sup>，五月路过金山寺，见李公麟所画的苏轼像，遂题诗其上：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sup>233</sup>

---

<sup>232</sup> 依《施谱》：“初，先生决计与子由同居颖昌，俄闻时论已变，自度不可居近地。”遂决计归常。

<sup>233</sup>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自题金山画像〉卷四十八，《苏轼诗集》第八册，页2641。

此乃苏轼对自己一生的论断，然而，此意并非犹言对尘世心灰意冷，任凭自身随波逐流。按“心似已灰之木”句语出《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sup>234</sup>在郭象注云：“死灰槁木，取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其是非者，其体中独任天真而已。”<sup>235</sup>此意为只要达物我两忘便能体会“天真”的人生境界。而“身如不系之舟”句亦出于《庄子·列御寇》：“巧者劳而知者忧，无能者无所求，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虚而遨游者也。”<sup>236</sup>意指摒弃智谋巧思，放任自然的人生态度，犹如虚舟漂行而无所系绊，自由自适。苏轼此语意，乃言一般人的喜忧悲乐皆由外在因素所操控与决定，然而，在苏轼看来，灰心与漂泊之苦，只在一念之间，取决于自己对于人生的一种态度。“问汝平生功业”句，实则为自嘲之语，此三州皆为苏轼遭受贬谪之处，但于中又带自豪之语，因着十年的贬居生活致使苏轼对于人生思考的发展起着莫大的影响。倘若没有黄州、惠州、儋州吹尽一番的寒彻骨，而苏轼也就不会有那一身兼容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的梅花香了。

---

<sup>234</sup>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齐物论》卷一下，《庄子集释》上册，页43。

<sup>235</sup>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齐物论》卷一下，《庄子集释》上册，页44。

<sup>236</sup>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列御寇》卷十上，《庄子集释》下册，页1040。

## 参考文献

以下的书目乃以中文姓氏的现代汉语拼音为排列依序。

1. 【唐】白居易撰，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 程树德著，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3. 【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八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
4.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
5. 黄淮学院主办：《天中学刊》，河南：驻马店黄淮学院天中学刊编辑部出版，2003。
6. 【日】吉川幸次郎著，郑清茂译：《宋诗概说》，香港：香港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7. 【清】焦循著，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
8. 【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尚书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9. 孔凡礼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2004。
10.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
11.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12. 【南唐】李璟、李煜著，王仲文校订：《南唐二主词校订》，北京：中华书局，2007。
13. 【宋】李焘著，【清】黄以周等辑注，顾吉辰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北京：中华书局，2004。
14. 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台北：三民书局，1996，页 159。
15. 刘石著：《苏轼词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6. 【南朝宋】刘义庆著，圩震鄂编：《世说新语》，北京：中华书局，2006。
17. 【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
18.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19. 【宋】秦观著，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0. 【楚】屈原著，金开诚等校注：《屈原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
21. 叔本华著，范进等译：《叔本华论说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22.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4。
23. 【宋】苏轼著，【明】茅维编，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24. 【宋】苏轼著，【清】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25. 【宋】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26. 【宋】苏辙著，陈洪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27. 唐圭璋主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
28. 唐圭章等主编：《唐宋词鉴赏辞典（唐·五代·北宋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8。
29. 唐圭章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99。
30. 【晋】陶潜著，杨勇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31. 【元】脱脱著：《宋史》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
32.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33. 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4. 【清】吴楚材、吴调侯选注，安平秋点校：《古文观止》，北京：中华书局，1987。
35. 【宋】吴自牧著：《梦粱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
36. 【宋】晏殊著：《二晏词》，台北：世界书局，1981。
37. 【金】元好问著：《遗山先生文集》，《四部备要》，北京：中华书局，1989。

38. 【宋】曾巩著，陈杏珍、晁继周点校：《曾巩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3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0.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北京：北京学苑，2004。
41. 周先慎主编：《苏轼散文赏析集》，成都：巴蜀书社，1994。
42. 朱自清著：《朱自清说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3. 鄒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
44.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李学勤主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